

再論風格與新聞風格

——以《綜合月刊》為例*

施祖琪、臧國仁**

《摘要》

本研究旨在延續過去有關風格之討論，嘗試建構新聞風格之初步分析架構。研究者以《綜合月刊》為個案研究對象，針對十六位曾任職於該刊之主編與編輯深入訪談，試圖了解其新聞組織文化、新聞組織常規以及新聞語言常規之獨特特徵。資料分析發現，《綜合月刊》之組織文化受到創辦人張任飛與各任主編影響甚鉅，各時期主編因應社會及新聞產業情境變化曾發揮深淺不一之影響，然皆未悖離《綜合月刊》初期組織文化內涵中有關新聞專業素養的理念。此外，早期主編與張任飛理念接近，扮演傳遞與維繫組織文化之重要角色。後期主編與張氏理念時有差異，《綜合月刊》的組織文化內涵也因而隨之轉變。本研究因而認為，新聞媒體之新聞風格係來自特定情境背景（含社會文化情境與新聞行業常規）下，受組織文化影響而在工作常規（即組織與語言常規）方面所展現之獨特特徵。

關鍵詞：風格、新聞風格、組織文化、新聞常規、綜合月刊

投稿日期：2003年4月8日；通過日期：2003年7月21日。

* 本文改寫自第一位作者之碩士論文《新聞風格影響因素探析——以《綜合月刊》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2001），第二作者係論文指導教授。作者感謝接受本研究訪談之所有《綜合月刊》前任主編與編輯，並以此文紀念張任飛先生逝世二十週年（1916-1983），感念他當年帶領一批又一批年輕學子投身新聞雜誌事業的熱誠。兩位《新聞學研究》匿名評審的意見對本文修改極有助益，一併致謝。

** 作者施祖琪現任職於台北IBM公司公關部門，臧國仁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E-mail: kjt1026@nccu.edu.tw。

壹、研究動機

有關風格的討論最早見於修辭學，涉及了演說者須採用合乎個人特質與場合（合宜性）之演辯風格（Abrams, 1981）。文學領域裡有關風格的討論儘管分歧，也大抵不脫風格須合乎文學主題之議（Danziger & Johnson, 1966）。風格定義眾多，不同領域常以不同角度看待風格，但此種「合宜」（appropriateness）概念始終為其重要內涵。

中國文學理論重要著作《文心雕龍》作者劉勰曾在《體性》篇談到風格概念，認為「體」即文體，「性」則是與風格形成有關之作家個性。劉勰歸納出四組兩兩相異之文體風格：「雅（即典雅）」與「奇反（即新奇）」、「奧（即用辭深奧文雅）」與「顯殊（即直接而具說服力）」、「繁（即多用比喻修飾詞藻）」與「約舛（即文字精練）」，以及「壯（即立論高超，用辭華麗）」與「輕乖（即內容貧乏，迎合世俗）」八體，各有特點，亦可相輔相成（杜黎均，1992）。

在「體」之外，劉勰認為作家的「性」乃形成獨特風格之基本因素，為個人先天特有氣質與後天學習結合而成之不同個性與特徵。故劉勰謂，「因性以練才，摹體以定習，文之司南，用此道也」，即主張作者要根據個性發展寫作才華，方能發揮個人才情特點形成獨特風格（杜黎均，1992；張文勳，1994）。顯然劉勰亦認為作者個性與其文章風格有關，須依個性特質培養並選擇合適（合宜）的文體，方能形成個人風格。

從這個角度切入，新聞風格似也可視為是一種新聞媒體對「合宜」行為的期許與標準：凡合乎新聞組織期許的行為與表現，就展現了該組織的風格，產製的報導方可刊出或播出。反之，不合標準的行為即屬與組織風格不合，自然易遭剔除。也就是說，新聞風格的功能類似品質管制，在某些環節最易發揮作用並影響其新聞風貌。

本研究延續兩位作者過去有關風格與新聞風格的討論（臧國仁、施祖琪，1999），旨在深究哪些因素影響新聞媒體決定何種行為或產品方為「合宜」之表現，並藉由追述相關定義以期進一步了解風格概念之內涵。本研究以一九六〇、七〇年代，品質著稱之《綜合月刊》為例，討論影響該雜誌風格之相關因素，藉此瞭解下列研究問題：

1. 個別新聞媒體（如《綜合月刊》）在其組織文化影響下，組織常規是否仍具獨特特徵？

- 1.1. 在組織文化影響下，該媒體在新聞價值、閱聽人定位、路線分配與時間等組織常規有何獨特特徵？
2. 個別新聞媒體（如《綜合月刊》）在其組織文化影響下，語言常規是否仍具獨特特徵？
 - 2.1. 在組織文化影響下，媒體在寫作結構與修辭技巧等語言常規上有何獨特特徵？

貳、文獻探討——再論風格與新聞風格

一、風格的基本概念——獨特特徵

大抵來說，有關風格概念的文獻探討似未出以下兩個面向（Barthes, 1971）：

（一）「內容」與「形式」

古典修辭學及文學批評傳統上習將事務本身（matter）及行事方法（manner）加以區分，即分辨「說什麼」及「如何說」之不同（Preminger, 1986: 268-269）。風格尤指形式，即外加於內容之處，或說話者（或寫作者）使用語言展現信息的方法。

然而即使風格的內涵傳統上侷限於形式層面，學者已就「內容」與「形式」對立的概念多所修正。如Keyser（1980）發現，詩歌的意義與句法、語意、結構等內容機制均關係密切，難以區分。王宏喜（1992: 3-8）在探討文體種類與特色時亦指出，任何文章都應是內容與形式的結合，而文體的表達方式、篇章結構、語體形式都受內容主題（或文章中心思想）影響。石璞（1983: 307）認為，文學批評家探討作家風格時往往不會遺漏作家在主題選擇、取捨方面的特性。如莎士比亞之戲劇，不但內容深刻地反映當時英國社會的階級鬥爭，形式上又佐以高深的語言藝術技巧，因而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的高度結合，隨後形成特殊戲劇風格。又如在藝術領域方面，主題（內容）與形式間也難以分隔，否則許多主題相同的藝術作品也就不會被眾多創作者以不同形式或材質來重複創作了（Munro, 1963: 257）。

Miles（1974: 35-40）認為，研究文學作品除了探究形式結構外，還要探明結構及題材（內容）間的關係，也就是在思索「如何」與「什麼」外，也要探究「內容比例為何」，其意亦同。

(二)「常規」(norm)與「變異」(deviation)

一般而言，風格乃指常規的變異。如某作品因具與眾不同的特質，對照較為平常或標準的做法，其特殊表現方法就可辨識出來。所謂「平常」，就是經常出現、最容易被預期到的成份，而變異就是經由某些機制（如文學上的對仗、雙韻等）所形成的不可預期、不正常成份。因此，「變異」即不尋常的表現手法，因其較具特色而產生風格。

Enkvist (1973) 延伸上述看法指出，常規與變異可視為是「相互比較」的關係。如語言學家分析作品風格時，可將文本某部份與其他部份或整體相比，也可將整部作品與當代文學傳統、其他文本或批評者心中的標準比較。不過，常規與變異間必須包含「文本／情境性的關連」(contextual relationship)，也就是文本在內部語言機制（如句法、語音等）與結構（如韻腳、文本各部份間）間之關連，或是在外部層次（如時期、文體、作者與讀者關係、社會情境等）上之結合程度 (Enkvist, 1964)。

依此觀之，風格來自變異，而變異乃相對於常規。以文學角度來說，有了語言常規、文學常規、時代特有常規，作家才能據此做出變異形式，隨後形成風格。基於此種「變異」乃「常規」的前提，批評家鑑賞文學作品時，一方面要找出作品與眾不同之處，另方面則要把作品「放回」某個時代或群體系列中進行探究，也就是區別傳統與作家個人之創新 (Peyre, 1965: 13)。而在藝術鑑賞方面，如巴東 (1996: 161) 評張大千的畫風曾謂，「將古人各家各派的筆墨技法（即既有之繪畫語言）……以創新繪畫語言（如其潑墨潑彩之畫風）呈現出完全屬於個人之風格面貌」（括號內均出自原作者），其意亦同。

綜合觀之，如上述「把作品放回某時代或群體的系列中」或「【呈現】古人各家各派的筆墨技法」等說法，皆在強調創作者所處之時空情境經常出現之固有部份（「常規」），而上述「作品與眾不同之處（見上段引自Peyre之語）」與「創新的繪畫語言（見上段引自巴東之語）」，指的則是創作者對常規所做之「變異」，也就是獨特風格之所在了。

既如上述，風格概念理應包括「形式」與「內容」以及「變異」與「常規」兩種二元對立現象，一般文獻則僅將風格歸類於「形式」與「變異」的展現 (Carter & Nash, 1990)。不過，除了前述已指出形式與內容皆與風格息息相關外，風格之變異概念仍不能完全獨立於常規外。Verma (1980) 曾將風格的「常規」與「變異」

之對立觀念修正為「常規」與「變異」的結合，認為說話或寫作都是一種「再創造」，即藉後天教養以展現天分的過程。此地所謂的「後天教養」，應即指上述之常規或傳統；而「天分」就是個人對傳統所作的創新與變異。

（三）選擇——「變異」與「常規」的首要延伸

如上述，傳統之「常規」與「變異」對立觀念其實隱含了「選擇」(choices)成份。以文學創作為例，作家身處文化與文學傳統之情境限制，皆曾面臨語言、文學、文化常規所「指定」的各種材料，而與其他作家共享某些觀念與語用特色(Miles, 1974)。創作者須透過選擇機制在這些材料中確定所要變異或創新的部份並加以組織，方能形成獨特風格；此即Verma (1980)所謂風格為在語言及文學常規架構內的「選擇模式」之意。

風格學(stylistics)亦曾對風格定義另行指出，「在可能的選擇中挑選出特定語言形式或特質」(Thornborrow & Wareing, 1998: 3)；Ullmann (1957)則謂，風格展現之前提為「在不同表達形式間有所選擇」(Lang, 1987: 172)。嚴格來說，以上兩者都暗指風格實是創作者在眾多條件中所做的抉擇，而這些抉擇仍受常規所限。

語言風格研究者認為，任何風格都是語言要素與語言手段之選擇與組織的結果(張德明, 1995: 80)，即語言風格乃說話者(或寫作者)在常規要素中有所選擇並加以組織後所形成的結果。藝術批評者並稱，風格是一種選擇並組織藝術要素的特殊方法(Munro, 1963: 252)；此處所指的「藝術要素」，即藝術家在常規規範下所擁有的選擇。另在文學批評方面，Miles (1974)指出，每個作品的紋理(texture)都存有當代對語言用法的共識，包括對形式及字彙等語言要素的特定偏好選擇、對語言材料的獨特使用比例等；不同時代的文學作品所使用之名詞、動名詞、形容詞的使用比例，因而也有所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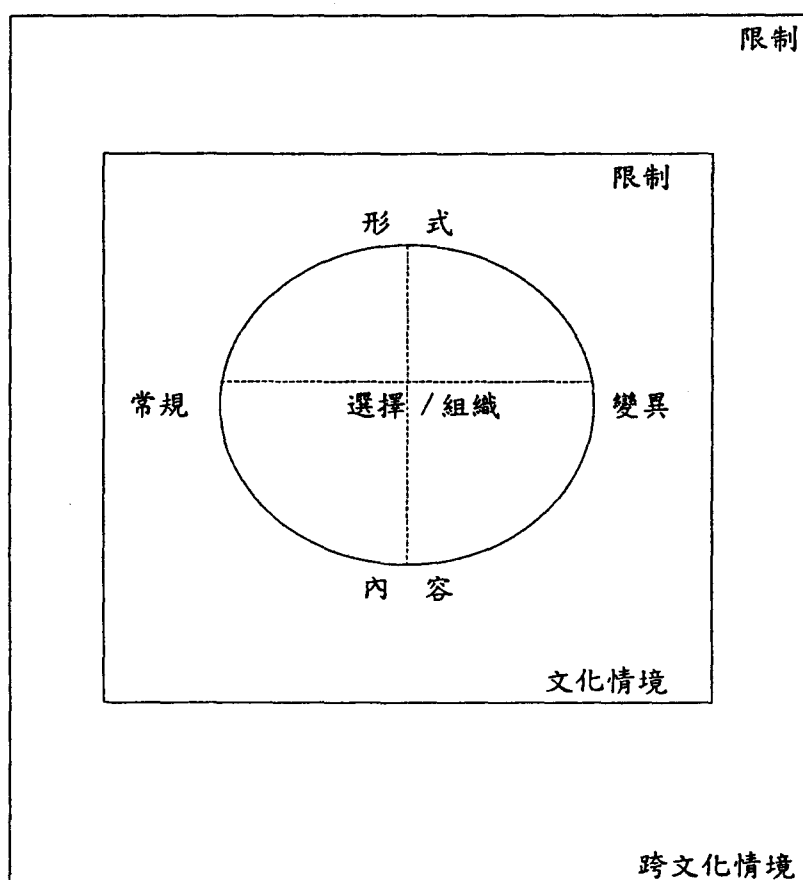
（四）限制——「變異」與「常規」的另一延伸

Meyer (1987)在研究音樂風格時指出，風格來自「人類在某些限制中所做出的選擇」。所謂「限制」(constraints)，其功能乃在建構出創作者得以選擇的範圍，而多數限制都為「默識」(tacit knowledge)，個人難以察覺，係個人或團體在歷史文化環境中所接受或習得的部份。這種說法反映了前述Verma提出「風格是天分加

上後天教養」的觀點，顯示人們會在後天學得的常規中加入創新部份，因而形成風格。

Meyer進一步指出，欣賞藝術作品其實不單要看作品所呈現的內容，還要考量創作者所處的特定情境，並分析作品中未予呈現的部份，此即「限制」的層次。限制存在於許多層面，如跨文化限制來自人類生理或心理的共有特質，並不屬於特定社會或時期所有。在跨文化限制之外，個別文化之意識形態、社會文教機構、科技發展進程以及符號系統也係風格的限制條件。而特定時期（如巴洛克時期）或文藝活動（如印象主義）、特定音樂家的創作習性或特定作品均受不同限制影響，規範了創作者不同的選擇條件。

總之，結合上述各種與風格特徵相關的意涵，此地或可將風格先定義為「個人或團體在特定情境下所做或說某件事時，配合其內容而在語言或特定行事規則（即常規）限制範圍內所進行的選擇與組織，而於呈現方法上產生獨特之處」（見圖一）。



來源：本研究

圖一：風格之基本概念

二、新聞風格與新聞常規

新聞媒體之任務旨在報導時事，感知社會脈動之能力特別敏銳。學者嘗謂，不同媒介的記者大都做著同樣事情（Campbell & Wolseley, 1961），如「截稿壓力」與「新聞報導寫作形式」等均為記者們所共享的行事方法，或可稱為「新聞工作常規（簡稱「新聞常規」）」，意謂「新聞媒體組織為完成任務，所發展之可重複使用且成為慣例的工作程序」（Shoemaker & Reese, 1991: 105），在心理及行為層面影響整體新聞社群處理新聞的理念甚鉅（Sigal, 1973; Barrat, 1986）。

新聞工作者需要常規，乃因新聞組織之資源有限，而發生於真實世界的新聞素材無限，其（常規）功用即在協助新聞組織在有限時間與空間內，以最有效方式提供最能為消費者所接受之產品（Shoemaker & Reese, 1991）。Tuchman（1977, 1978）指出，新聞媒體與一般組織一樣都須發展工作分類標準，減化繁複工作流程並加快處理效率。如「路線分配」便是影響記者工作的常規之一，協助記者辨識各自任務範疇，以便組織能長久且定期地由此獲取訊息；路線劃分得愈細密，媒體就愈可能「鉤住」愈多的社會事件。所以，媒體依據本身的經濟條件規劃出最合乎組織需求的資源分配路線，在有限時間與人力資源的情況下提供新聞成品（Tuchman, 1978; Turow, 1992）。

因此，常規的功能可簡述為「協助組織節省時間以加速達成任務的工作流程」。如Stinchcombe所言（錄自Cohen, 1996: 189），組織工作常規讓成員能遵循既定規則處理個人責任範圍內的任務，節省許多請求上級指示的時間，因而加快組織的生產效率。Sigal（1973）曾謂，新聞產製過程為常規性行為（routine behavior），如記者經常倚賴官方消息來源之新聞稿，使得新聞內容充斥官方訊息，成為政府與新聞兩種組織的合作產物。

總之，工作常規對新聞報導內容影響深遠（Molotch & Lester, 1974），反映了媒介組織的產製過程並非全屬客觀真實（Epstein, 1973; Phillips, 1977; Sigal, 1973; Tuchman, 1978）。在記者發現事件、判定事件意義、查證事件真實性、並加以報導的每一環節裡，常規幫助新聞從業人員將外在世界轉化為一則則新聞，故新聞可謂是新聞工作者循常規加以產製的結果（Fishman, 1980），或如Shoemaker & Reese（1991: 121）所稱，「新聞是組織在常規引導下所定義的結果」。

如新聞價值（news value）或新聞判斷（news judgment）就是新聞工作常規中

極為重要的專業判斷準則 (Gans, 1980; Bell, 1991)，指導記者該選擇什麼、該報導什麼。新聞價值的工作常規影響記者決定何種事件為具有「可報導潛力」，也讓記者在截稿時間內得以決定究竟應該優先處理哪些新聞 (van Dijk, 1988: 7-9)。

許舜青 (1994: 2-18) 曾試從新聞寫作教科書中整理出一些普遍認同的新聞價值，包括：負面性、時間的新近性、地點的鄰近性、事件或牽涉人物的顯著性、事件的影響性、資訊的真實性、與當地風俗的一致性、事件的突發性、及人情趣味性等；有些屬全體新聞界所共同認可，有些則為某些個別媒體專有，如電視新聞部門對拍攝未成年嫌犯的鏡頭就有個別不同處理手法。新聞價值既是記者選擇及報導的準則，新聞媒體間對於新聞價值的不同認定也影響到各自呈現的新聞內容，因而形成不同新聞組織風格。

新聞組織的另一常規是時間規範。新聞工作具有獨特工作節奏，使得新聞媒體可規律地出版或播出新聞，否則即會為組織帶來重大損失。故一般媒體皆會設定截稿時間，儘可能地確保新聞產製的穩定性 (Fishman, 1980)。由於受到截稿壓力的影響，有些事件可能在截稿之前尚未發展完成而未能加以報導，使得傳統新聞寫作的敘述方法不如小說般地有完整結局 (Bell, 1991)。

一般而言，新聞寫作形式規範經常限制了新聞取捨的角度，最明顯之處就是將事件發生結果置於導言的倒寶塔式寫作策略，其主要結構是「導言」與「軀幹」，即先出現一段摘要式導言，再出現軀幹，分段敘述事件細節 (楊素芬, 1996)。這種敘述順序使得新聞工作者在寫作中往往簡化事件複雜性。如在新聞標題裡，編輯須以簡短字句描繪整個事件，故常採用簡短口號。至於在新聞導言部份，記者亦無須具備深厚背景知識或理論基礎，只要把事件依內容重要性逐段陳述，就可將繁複事件簡化，加速寫作及編輯的速度 (Sigal, 1973)。

新聞語言常規除了表現在新聞寫作結構外，還在修辭技巧中清晰可見。如為了讓讀者相信新聞所載皆是客觀、正確、公正且可信的事實而非虛構杜撰，新聞體的修辭限制就較其他文體為多 (許舜青, 1994: 3-9)。翁秀琪等人 (1999) 認為，新聞報導從文本到字詞都可能執行「建構事實」的功能，以傳達新聞報導為真的概念。如在字詞層面使用「陳述屬真」的語言形式 (如「她已經出門了」)，或以與語態 (modality) 相關之字詞展現事件真實程度 (如「他一定已出門了」的確定程度就強於「他應該已出門了」)。在文法結構層面，透過第三人稱或不描述內在情緒的方式，刻意隱藏對記者之個人好惡。在修辭層面上，新聞記者之語言常扮演傳話者

的角色，建構中立發言位置。此外，記者可以透過對於細節及過程鉅細靡遺地描述，來加強新聞報導的真實成份。

總之，新聞媒體長久以來已發展出各種特定工作常規，以便更有效率地完成工作。倒寶塔寫作形式能加速新聞產製與閱聽人吸收訊息的速度，有關修辭技巧的常規則幫助記者有效地說服讀者相信報導的真實性。這些常規長久以來已成為新聞工作者之既定行事準則，影響新聞產製過程中選擇事件、採集資料以及寫作等每個步驟，因而也影響到新聞內容的展現。不過，新聞工作常規似屬行業規範，而非某一新聞組織之專屬特性。若要分析特定媒體組織之新聞風格，還須進一步探究該組織如何受到組織文化影響。

三、組織文化：內涵與形式

不同學者曾針對「組織文化」提出不同解釋，如組織的「哲學觀」、「世界觀」、「成員共享之思考習慣或心智模式」、「共享意義」、「共享價值觀」、「共同信念」等（參見Schein, 1985；林乾文，1998）。從功能論出發的學者視組織文化為組織在內部整合與外部適應過程中，集體學習與解決問題的產物。而符號論學者則認為，組織文化為成員集體賦予組織生活之意義，經由互相關連之符號系統傳達，並透過神話、故事、儀式等內在形式維持（Schultz, 1994）。Ott（1989）曾整理五十八篇文獻，歸納出七十三種定義組織文化的語彙，足見組織文化定義之分歧。Schein（1985: 9）提出一結合功能論與符號論角度，且迄今為止引用最為廣泛之組織文化定義：「群體在解決其外在適應與內部整合問題時，所學得的一組共享基本假設（basic assumptions），因其運作良好，故被視為有效而傳授給新進成員，作為未來遇到同樣問題時，知覺、思考及感覺的正確方法」。

簡言之，Schein上述之「基本假設」係指組織文化的核心部份，即組織成員對內外環境的基礎信念，涉及了組織與環境的關係為何、真實的意義為何、人性本質為何、人類活動本質為何、以及人際關係本質為何等問題（Schein, 1985），長久下來協助組織完成任務而漸被成員視為理所當然（taken-for-granted），成為工作中不自覺的默識，協助組織適應外在環境並達成組織整合內部之效（Ott, 1989）。

依據基本假設，組織建立了可測量與知覺的價值觀（values），此即Schein所指之組織文化第二層次，係組織對「何者應屬正確但非必然」之看法（Schein, 1985）。Ott（1989）則進一步說明幾種與價值觀類似且關係密切之概念，包括「信

念 (beliefs)」，為人們在心中所信為真或假、事實或非事實之事。信念與價值觀兩者意義相近，不同之處在於價值觀尚反映情感方面之需求，而提供行事動力之信念則合理化組織行為。

以媒體而言，前節所述之新聞價值常規即屬此一層次，一方面提供記者報導的動力，另一方面也協助成員（記者與編輯）合理化媒體選擇特定新聞報導的行為。而新聞媒體常以社會公器自居，往往對組織在道德方面之行事標準做出特定規範，如客觀正確報導規範即反映了媒體對誠實的要求。

價值觀與信念影響並反映於組織行為模式及組織人造物件上，此即組織文化之第三層「人造物件 (artifact)」層次。有些人造物件為具體事物，如文件、空間陳設、服裝規定、電腦或其他設備的擺設等，而語言（行話、隱喻、組織故事、英雄人物事蹟、神話、笑話等）及組織行為模式（含儀式與行為常規）等物件較為抽象 (Ott, 1989)。新聞媒體的編採手冊即屬人造物件之具體層次，其對組織政策及信念的內容陳述反映出組織的價值觀所在。而前述新聞組織之組織常規（如路線）與語言常規（如寫作與修辭）不但影響成員形成特定行為模式，經常也顯現組織特定之價值觀與信念。

組織文化如何形成？Schein (1991)、Alvesson (1993) 特別強調「創始者 (founders)」的影響。在組織發展之初，創始人依其個人文化背景與人格特質將其解決組織內外環境問題的某些看法帶入組織，並結合志同道合之士（經常是早期的高階主管）組成核心團體，為組織共同目標努力奮鬥。在組織創建後，創始人會按初定目標招集新員工或事業夥伴，盡力使其認同這些目標。而創始人的假設與信念會隨時間變動而有所調整，但其對組織文化卻始終具有最強大之影響力。

Ott (1989) 延伸Schein之說，為組織文化概念加入實際情境因素。他指出，組織文化皆係社會文化環境、產業性質與產業環境、以及創始人等因素的結合，彼此息息相關：社會文化環境影響創始人之基本假設，創始人之基本假設影響組織之產業特質，而產業環境也會影響並被社會文化影響；三者結合便形成每個組織之獨特文化內涵。

Ott 還指出，組織文化以多種方式傳遞與普及。首先，組織雇用價值觀相似的成員（即「先社會化 (presocialized)」者），經社會化過程塑建其行為並協助其適應後，經由互動習得合乎其團體地位之行為。其後，成員透過合理化這些行為的價值觀與信念，一方面達成組織要求並獲得獎勵或因達成要求而遭懲戒，另一方面也藉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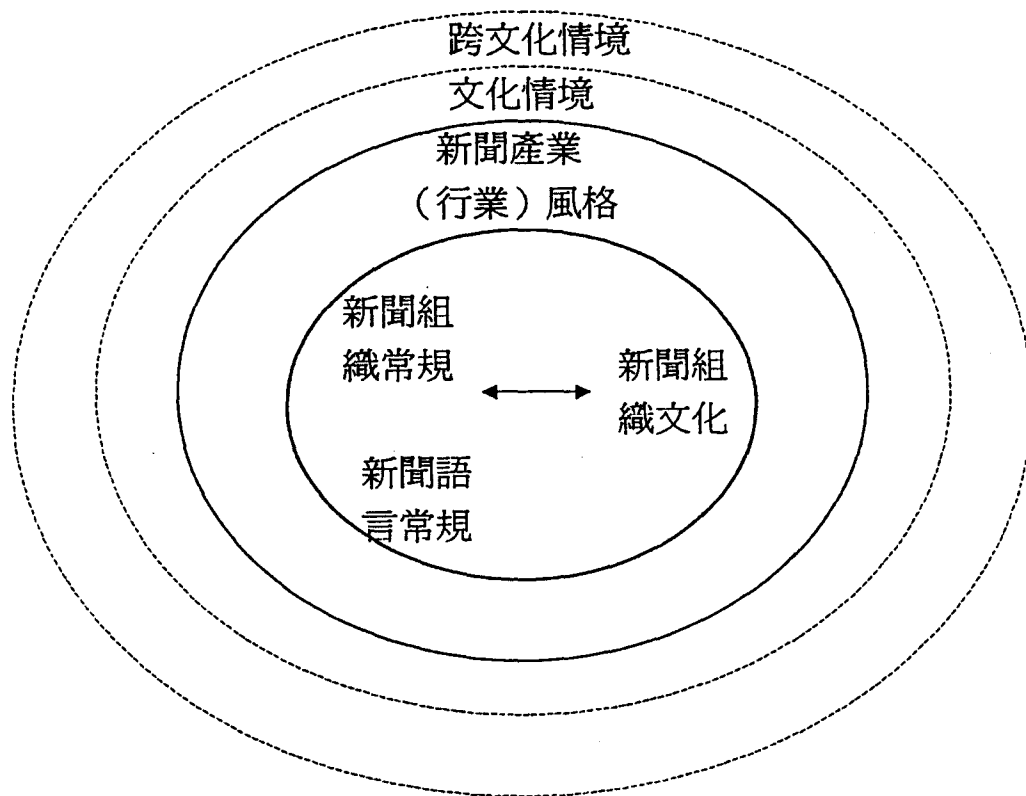
織特定語言、隱喻、神話及故事等溝通形式，有效地傳遞組織文化的基本假設、價值觀、行為模式。

在新聞媒體中，組織文化一旦形成，會以各種機制維繫。首先，「先社會化」過程同樣存在於新聞組織，亦即不但記者選擇與自己政治或專業立場相近之媒體應徵，新聞媒體也以該組織特有之用人方針，有意無意地挑選出與組織價值觀相近之成員（Sigelman, 1973）。Breed（1997；參見Hirsch, 1977; Sigelman, 1973）在一篇論文中即指出，媒介組織與其他企業類似，都有一些行之已久的政策或行事常規，某些部份並不明顯或根本未行諸於文字，使得新進工作者必須經歷內在社會化過程始能逐漸習得，如透過上稿多寡獲知發行人對新聞選擇與呈現方式之個人偏好（參見 Warner, 1970; Tunstall, 1971）。

綜合上述，組織文化乃因應特定社會文化、產業環境及關鍵人物（包括創始人、發行人、早期高階主管、高階主管）特質等因素交互作用之結果，新聞組織經由用人政策（包括政治或專業立場相似者之先社會化、聘用與解雇成員的標準）與組織社會化（包括編輯對稿件所作修改與內部獎懲方式）等機制，傳遞了價值觀與基本假設。而組織文化的發展既為團體學習的過程，組織成員與領導者在文化傳遞過程中的互動因而也對組織文化造成影響。

四、本節小結——影響新聞風格的因素

根據上述討論，新聞風格承襲了風格之「獨特特徵」特質，在時空情境與行業常規的限制下，特別強調組織文化的統一特質。歸納上述討論可知，新聞風格即是社會文化情境、新聞行業常規、組織文化三種影響力獨特組合結果的動態展現，可定義為：「在特定社會文化情境中，新聞媒體在組織文化（如產業特質、關鍵人物理念、人事結構、及新進員工社會化等特性所形成之）影響下，展現於組織常規（包括新聞價值、讀者定位、路線分配、時間規劃等）以及語言常規（包括新聞結構、修辭技巧等）方面的獨特特徵」（見圖二）。



來源：本研究

圖二：新聞風格的內涵——基本研究架構

參、研究問題與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如前所述，新聞媒體在其獨特組織文化影響下，將新聞行業工作常規轉化為組織內之工作常規，因而形成媒體組織之獨特新聞風格。由文獻探討可知，「新聞行業工作常規」與「新聞組織工作常規」可視為如風格之「常規」與「變異」之對應關係，而組織文化乃係轉化行業工作常規為組織工作常規的力量。本研究之主要研究目的，即在於分析新聞行業工作常規如何在特定新聞組織之組織文化影響下，被轉化為獨特之組織工作常規，因而形塑出獨特之新聞組織風格。

根據上述之研究架構，本研究擬分析新聞媒體在其組織文化影響下是否形成獨特之新聞風格，而新聞媒體組織文化的特質可續分為社會文化、新聞產業環境、關鍵人物、用人政策以及組織社會化機制等成份，操作化定義分別陳述如下。

-- 社會文化：影響新聞組織運作之社會文化因素，包含人民教育程度、政治及經濟狀況等三項，本研究將以民眾識字率與學歷人口比率推估人民教育程度，並經由受訪者描述，了解該組織運作期間之社會政治與經濟狀況；

-- 新聞產業環境：本研究擬以新聞媒體之數量、所有權形態、分佈區域以及產製技術，作為探究新聞產業文化之指標，並由訪談探究特定新聞組織在所有權形態、分佈區域及產製技術上有無與眾不同之處；

-- 關鍵人物：如文獻討論所述，影響新聞組織文化的關鍵人物，包含創始人、發行人、早期高階主管與高階主管（如總編輯／主編），然而各組織關鍵人物或依組織發展背景不同而異，因此某些明星記者或採訪主任等成員也可能影響組織文化。本研究擬由探詢受訪者之意見判斷組織之關鍵人物，再探究這些關鍵人物之人格特質、經營理念、價值觀與道德標準對該組織文化之影響；

-- 用人政策：包括成員進入組織前之先社會化過程、組織聘用與解雇成員的標準，本研究將探究新聞組織是否偏好具特定價值觀或政治立場之成員，以及該組織聘用新成員與解雇成員之標準；

-- 組織社會化過程：如前節所述，組織社會化過程常屬非正式且全面性，除少數行之爲文的政策外，新手記者往往經由與老手接觸習得媒體組織之政策。然而此種新舊成員間非正式的互動不易探究，本研究故而將著重編輯改稿之主要原則，以及媒體內部對於表現優劣者之獎懲方式，作為探究新聞組織社會化過程之指標。

至於受到新聞媒體組織文化影響之語言及組織等常規獨特特徵，可續定義如下：

-- 組織常規：在組織層面包括新聞價值、閱聽人定位、路線分配、時間規範，新聞價值可定義為新聞媒體對特定內容新聞之選擇，以該組織關鍵人物（含創始人、發行人、早期高階主管、高階主管、具獨特影響力之記者或編輯）所偏好之新聞選擇標準為分析其新聞價值獨特特徵之準則。閱聽人定位指媒體設定之閱聽眾的範圍，或根據銷售量或收視率所理解之閱聽人人數。路線分配方面，本研究擬以受訪新聞組織在其編採手冊中對路線的規定，或其成品內容呈現之特定主題、地區或社會機構為該組織路線分配之判定準則。時間規範在本研究中除指截稿時間外，尚包括組織對工作流程及內容時效性的規定。

-- 語言常規：語言層面之常規包括新聞寫作結構與修辭技巧。本研究擬以關鍵人物對倒寶塔寫作形式之態度與規範，作為了解其新聞寫作結構常規之標準。此

外，為了解新聞組織在修辭技巧常規上的獨特性，本研究將探究該組織關鍵人物對於新聞內容在字、詞、語句方面的特殊規定。

二、研究設計

本研究旨在建構新聞風格之架構，並以此架構描述特定新聞媒體之風格，故採取個案研究法，針對樣本進行深入分析與觀察，並透過訪談法以了解該媒體之新聞風格。文獻顯示，深入訪談法可讓研究者藉由訪談過程深入了解受訪者在特定情境下的經驗與意義（Seidman, 1998; Rubin & Rubin, 1995）。本研究欲探討個案媒體獨具風格之因，以及其組織文化對記者與編輯工作之影響。

本研究擬以《綜合月刊》為分析個案，原因有二：

（一）運作時間夠長，應足以形成風格

藝術評論大家 Ackerman（1963）曾謂，每種藝術風格皆具穩定性，其獨特特徵呈現於特定地域或時代之作品。姜岱東（1996: 18）在《文學風格概論》書中，也曾將「穩定性」（定義為「同一作家的創作中，多次出現的前後一貫的藝術特徵」）列為文學風格之基本特徵之一。因此，特定風格的獨特特徵能否形成或能否為觀察者所察覺，與呈現該風格之作品能否持續一段時間，或能否廣佈一特定區域當有關。

本研究乃有意探索單一媒體之新聞風格，而非新聞界之整體新聞風格。雖然此新聞風格是否普及廣泛並非研究考量，但該風格是否持續一段時間則為本研究必要條件。

（二）《綜合月刊》具時代意義，有研究之必要性

《綜合月刊》創刊於民國五、六〇年代之際，經歷民國57年起開始實施九年國民教育、民國60年退出聯合國、民國62年開始興建十大建設、民國60至63年間能源危機等重大事件，正是國家政治與經濟狀況遭逢重大變遷之新聞界「戰國時代」。該刊創辦人張任飛當時同時經營多份雜誌，《綜合月刊》特別標榜為知識份子所辦之高水準雜誌，強調該刊對新聞素材之選擇與撰寫均有嚴格規定。許多曾任職者在該刊停辦後仍繼續在新聞實務界努力或轉任教學工作，因而有機會將當初所受之實務訓練與經驗廣為傳承，《綜合月刊》對今日新聞界之影響不可謂不大。

三、簡介研究個案《綜合月刊》

《綜合月刊》(Scoop Monthly)由張任飛於民國57年11月創辦，誕生於雜誌業發展迅速的民國五〇年代(楊志弘、林美惠，1989；李明水，1986)。張任飛原任當時最暢銷的《讀者文摘》中文版駐台代表，卻認為像《讀者文摘》如此高水準的雜誌竟為外國人所辦，實為本國人之恥(翁台生，1983)。四年後，《綜合月刊》問世時即標榜「這是由本國人辦給本國人看的高水準雜誌」，並且提出兩個口號，一是「最有影響力的雜誌」，一是「沒有一個廢字，沒有一句廢話的雜誌」(石永貴，1983；黃沁珠，1983)。

《綜合月刊》自詡為一份為知識份子所辦的雜誌(張任飛，1982年2月)，曾兩度(1977及1981年)獲新聞局優良雜誌金鼎獎的肯定(皇甫河旺，1991)。但其內容儘管完善也受到知識界好評，卻因不善市場開拓與經營管理，廣告太少，長期入不敷出，再加上發行人張任飛罹患肺癌，體力不繼，於創刊十四年後在71年2月出完最後一期(第一五九期)隨即停刊(皇甫河旺，1991；翁台生，1983；黃沁珠，1983)。

在《綜合月刊》為期十四年共一百五十九期的出刊中，有些堅持始終未變，形成整份雜誌的一貫特色。首先，《綜合月刊》強調高水準。從該刊創刊詞所述，「今天社會上不只需要一種，實在需要各種的好雜誌」(張任飛，1968年11月)，到最後一期告別辭謂「『綜合月刊』……是為我國各界知識份子創辦的一本雜誌，……我們決心要把這本雜誌辦好，為中國的雜誌事業盡一份心力」(張任飛，1982年2月:6)，以及各期「編者的話」欄中所述，都不斷地強調該刊有心辦好一份「好雜誌」的目標。

次者，該刊也不斷強調新觀念與新方法。如張任飛(1971:15)曾撰文指出：「新聞係發展中社會每天面臨到的新問題，而每一個新問題都是大家應該知道並且感到興趣之事，故報紙工作人員必須知道何為新觀念、新知識，以發掘以往不被視為新聞的新聞」。另在創刊詞中也謂，「我們在撰文、編輯、攝影、版面設計、發行等方面，都用新的觀念和方法。特點是很多的，尚請讀者們指教」。該刊曾首創「專欄」與「本國文摘欄」，一般論述文章都屬作者創作(張任飛，1968年11月:4)，即連譯文都是邀請作者以英文寫成後再由專人翻譯刊登。

張任飛(1975年6月；1976年4月；1980年11月)曾謂，歐美雜誌控制了亞

洲雜誌市場，報導內容偏頗，使得亞洲人處於受害人的地位，故主張亞洲雜誌出版人必須把本國雜誌辦好，《綜合月刊》就是基於這種「本國人為本國讀者辦」之精神而創辦。但另一方面，該刊也重視雜誌的世界觀，以「在台北發行的一本國際性雜誌」自居，要將世界性的新問題與新觀念介紹給讀者。

張任飛曾在中央通訊社工作多年，任內建議以語體文撰寫新聞（冷若水，1984），以便人人都能讀報，新聞更為普及，對我國新聞事業有極大的貢獻（黃沁珠，1983）。他創辦《綜合月刊》時格外重視寫作的簡明與口語化，要求文章要簡潔、通順、有創見（易行，訪談記錄），以深入淺出方式表達（黃沁珠，1983）；皇甫河旺（1991: 374）就曾謂，「該刊在寫作方面有獨特風格，力求易讀、易懂」。

四、《綜合月刊》發行人張任飛

張任飛出生於民國五年，本名銘龍，任飛原為別號。民國34年畢業於國立復旦大學新聞系後，進入中央通訊社編輯部工作，次年二月調派台灣擔任台北分社採訪組長，並於民國38年中央社總社遷台後升任採訪部副主任。也就是在這一年，他提出「以語體文寫新聞」的建議，因而導引了全國報紙新聞寫作的方向。民國48年間至美國波士頓大學新聞學院研究，開始接觸到世界各大通訊社及高水準的雜誌，從而萌生創辦雜誌之意（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1978: 1318）。

張氏於民國53年辭去中央社職務，創辦「現代關係社」，代理國內外商業與文化機構之公共關係與廣告。民國57年創辦《婦女雜誌》及《綜合月刊》後，又分於61年及66年創辦《小讀者》與《現代管理月刊》（黃沁珠，1983）。曾擔任國立政治大學及中國文化學院新聞系兼任副教授（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1978: 1318），也曾擔任政大「新聞系出版指導委員會」委員，負責指導《學生新聞》及英文《政治前鋒報》二份實習報紙（國立政治大學校刊，1961: 131）。自民國60年起任中華民國新聞評議委員會秘書長達十一年，也創辦了《新聞評議》月刊，直到71年因健康情況不佳才改任評議委員（黃沁珠，1983）。民國72年6月8日，張任飛死於肺癌，臨終僅留下「把雜誌辦好」的遺言。翌日，各大報皆以「中國的亨利魯斯」之名悼念他（皇甫河旺，1991）。

張任飛所辦的雜誌儘管都獲得肯定，卻因曲高和寡而虧損連連，早期還能靠現代關係社的盈餘填補，後來盈餘不足彌補虧損而致債台高築（黃沁珠，1983）。但

他仍獻身雜誌事業，極力想為本國人辦高水準的雜誌，因而推動了國內整個雜誌事業的發展（黃沁珠，1983）。在他過世後，中央日報說，「他開創了我國雜誌現代化的先河」（石永貴，1983：98），民生報（翁台生，1983年6月9日：7）推崇《綜合月刊》不但提升了當時的雜誌水準，也影響了其後許多高水準雜誌與報紙深度報導的方式。

五、本節小結

本節旨在建構新聞風格之分析架構。研究者基於研究對象之重要性、適切性，以及研究者個人興趣之考量，選擇以《綜合月刊》為本研究個案。本節簡介研究問題為「新聞媒體在組織文化影響下，組織常規／語言常規是否仍有何獨特特徵？」，次則詳述各概念之操作型定義，陳述研究方法乃個案研究與深入訪談法，並據研究架構列出訪談問題以及個案選擇標準，進而介紹個案《綜合月刊》之發展背景、內容特色及發行人生平，以期在深入訪談前儘可能掌握相關資料。

肆、資料分析——《綜合月刊》的新聞風格

一、訪談對象描述

本研究選擇曾任《綜合月刊》之主編與編輯為訪談對象，共十六位（名單見附錄一）。除張任飛與王紀五已歿外，其餘五位主編（皇甫河旺、汪琪、黃年、耿榮水與鄭至慧）皆完成訪談。受訪編輯包括王道平、賴俊達、鄭瑞城、王力行、翁台生、易行、胡遜、林秀英、李淑娟、陳忠慶、朱恩伶等十一位，任期涵蓋各主編時期，並囊括所有在該刊任職超過一年且目前人在國內者。

研究者依據受訪者針對研究問題之回應與《綜合月刊》內部資料（如公文、發行人張任飛手稿以及約稿作者名單），配合當時社會文化與新聞產業情境深入詮釋，並依據訪談結果以及相關資料於以下三部分依序分析《綜合月刊》組織文化、組織常規及語言常規之獨特特徵，並於最後一部分統整描述該刊新聞風格。

二、《綜合月刊》之組織文化

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問題，在於探討《綜合月刊》的組織文化特色。根據前節所述，新聞媒體組織文化為特定社會文化、新聞產業環境與關鍵人物特質等因素交

互作用之結果，經由媒體用人政策以及組織內部社會化過程傳遞並維繫該組織之價值觀與基本假設。本節分別討論《綜合月刊》關鍵人物特質、營運期間之社會文化與新聞產業情境，以了解該刊組織文化的內涵。

(一) 關鍵人物——創辦人張任飛

如前節所述，關鍵人物是形塑組織文化之重要因素，而新聞媒體創始人對組織文化之影響最為深遠，在組織創建之初依當時社會文化及產業情境所發展之哲學觀不但構成組織文化的基本內涵，也成為媒體組織成員的行為標準。

研究資料顯示，影響《綜合月刊》組織文化之關鍵人物實為發行人張任飛。而要了解張任飛如何影響《綜合月刊》的組織文化，須先介紹他的經營理念與價值觀。張任飛經常在演講或報刊提出他對雜誌事業的看法，如對《綜合月刊》社務運作方面，就曾在《綜合月刊》各專欄以本名或「彭瀚」及「費澤」筆名發表文章。王力行（訪談記錄，2001）即說，該刊「當時比較擲地有聲的文章都是他【張任飛】寫的」，以及「張先生的文章……常在關鍵時刻引進一些國外的做法」，可見編輯們係經由閱讀張任飛的文章而逐漸體會並內化其理念。

整體而論，張任飛認為雜誌必須現代化，而雜誌現代化就須力求專業。《綜合月刊》甫創辦時，我國雜誌事業仍處於「文人辦雜誌」與「機關團體辦雜誌」的年代，也就是三、五人因喜歡寫文章或特定政治目的而聚在一起辦雜誌，沒有廣告，不懂用企業方式經營，壽命也極短（訪談記錄，王力行，2001）。雜誌市場後來出現一些「商人辦雜誌」的形態，只為賺錢而無文化理想，以大量推銷方式販售（張任飛，1976）。張任飛（1983）認為，外國人辦雜誌的態度嚴謹，「中國人也應跟著學，假如不跟著學，那麼我們文化交流事業永遠不會進步」。所以，張任飛特別強調西方先進國家辦雜誌的現代化新觀念，與他個人理念融合，其核心就是「專業」要求。

「專業」，是張任飛與《綜合月刊》在經營方式、內容品質以及新聞專業各方面的理想。張任飛雇用的編輯多為新聞科系畢業者，又引入國外專業分工制度辦雜誌，為台灣首見，故王力行（訪談記錄，2001）推崇張任飛的《婦女雜誌》與《綜合月刊》為中國雜誌史的轉捩點。當時雜誌不受重視，閱讀風氣不盛，再加上新聞局規定雜誌不得設記者，《綜合月刊》為第一本設有專人採訪與約稿的專業雜誌，編輯對外須自稱為「張任飛先生辦公室的人」，以張任飛做《綜合月刊》的代名

詞，才會受到重視（訪談記錄，王力行、王道平，2001）。

在《綜合月刊》創刊時，張任飛常直接介入編輯約稿過程。皇甫河旺（訪談記錄，2001）即說，張任飛在三位編輯開列約稿名單後先行審核，刪掉名單上大部分作者後再加上幾位，才讓編輯開始約稿，而這些作者大都是張任飛透過個人私交、經人推薦、或在報刊上發掘到有見解的人。後來他對編輯約稿的介入就不再是直接審核，改以推薦或建議方式，如有時會介紹《綜合月刊》主編認識文化界朋友或年輕有為的學者專家。每當他在報章雜誌上看到文章寫得好又具創見，就會以口頭或寫紙條或以打勾方式交代主編邀稿（訪談記錄，鄭至慧，2001）。

除對約稿作者的要求外，張任飛也希望《綜合月刊》編輯要有創意，要從不同角度思考問題，把文章寫得既深入又具創見，也常針對新聞報導與編輯深談如何讓報導更為深入或發掘不同角度。王力行憶及，張任飛有次讀到鄭瑞城（現政大校長）的訪問問題頗有創意，就興奮地走到編輯部辦公室裡大聲宣佈。或許因為張任飛特別重視報導角度的新穎與深入，《綜合月刊》的編輯也常有討論的習慣。他還常說，「題目沒有好壞，只有文章才有好壞」（訪談記錄，王力行，2001），意思就是文章須有內容，而編輯的挑戰就在於把每個題目都寫得好。

在專業態度上，張任飛看不慣當時報社記者的某些習性，也經常在《綜合月刊》上批評新聞界的缺失。幾位受訪編輯都說，讀張氏的文章就知道他對編輯的要求（訪談記錄，王力行、翁台生、鄭至慧，2001）。他很重視個人、編輯以及《綜合月刊》的整體形象，從不和編輯進出聲色場所，還要求編輯要正派、專業、以正當方式取得消息，不可由旁門左道採訪。王力行（訪談記錄，2001）即言，「正派」在《綜合月刊》相當重要；張任飛為人正派，編輯也會耳濡目染，而與當時一些「流裡流氣」的記者有別。但另一方面，張任飛又覺得採訪須儘可能與消息來源接觸、互動，故不喜見到編輯待在辦公室，總是要他們出去跑新聞、請受訪者吃飯或喝咖啡（鄭瑞城，訪談記錄，2001）。

此外，張任飛很嚮往《時代雜誌》、《生活雜誌》與《讀者文摘》精選精編的制度，也覺得台灣報章雜誌來稿照登的慣例很不負責，而曾感嘆「我們自由中國只有出版商，沒有出版社」（張任飛，1983）。他在《綜合月刊》執行了一套嚴格的審稿制度，編輯除寫作能力外還要具備改稿能力。他曾說（1983），知名雜誌都改稿，「一要改文章內容，二要改文章的風格」。即連在發行與廣告部門裡，張任飛一貫要求品質與形象。發行部與廣告部的人即曾向《綜合月刊》編輯抱怨自己寫的

廣告信函被張任飛改得「只剩我的標點了」(訪談記錄,王力行,2001)。

簡言之,張任飛創辦《綜合月刊》,乃為實踐他為本國人辦好雜誌的理想。他心目中的好雜誌須由具有專業素養之專業人才所辦,而且要能提供新觀念與新知識,其經營理念即為此價值觀的延續——雜誌只要品質好,自然就會吸引讀者閱讀。

(二) 其他關鍵人物——歷任主編

張任飛於《綜合月刊》創刊初期自任主編,第八期後改請王紀五擔任主編。當時編輯對王紀五的印象是:下午才進辦公室,寫完稿、與編輯談天說笑後就離開了(訪談記錄,王力行、皇甫河旺,2001)。王紀五是掛名主編,《綜合月刊》仍由張任飛執掌任主編工作,既改編輯稿件(編輯部稱之「內稿」),也改邀來稿件(「外稿」)。後來改稿工作逐漸分給皇甫河旺(現任世新大學新聞系教授),而在皇甫河旺離職後,由王力行(現任《遠見雜誌》發行人)接下改稿工作。汪琪(現任香港浸會大學講座教授兼傳理學院院長)擔任主編(第五十三期)後,《綜合月刊》才真正有了主編;編務都由主編執掌,報導內容的選擇也完全交由編輯群負責。

在汪琪及皇甫河旺擔任主編時期,大致仍然延續張任飛的理念談論各種社會問題兼及新觀念的提出與解決之道。皇甫河旺參與創刊過程,又任主編職務達三年,很認同也很了解張任飛的理念(訪談記錄,皇甫河旺,2001),尤為維繫《綜合月刊》早期組織文化之重要人物。在專欄方面,這兩任主編延續了稍前的規劃,甚至有幾個專欄(如「八年抗戰」、「學苑小簡」、「影劇」以及「國際問題」專欄)持續多年,共歷經王紀五、汪琪、彭瀚(即張任飛之筆名)與皇甫河旺四屆主編,一直到黃年(現任《聯合晚報》社長)擔任主編時轉變才較為明顯。

黃年任主編時(1977年9月~1978年8月),正值本土運動與黨外民主運動開始興起之際,也是台灣政治轉型時期。黃年回顧當年理念時說,雜誌必須發揮影響力,不過較為希望《綜合月刊》能從新聞記者的角度報導與分析社會重大議題,引發各界討論,發揮影響力,而不僅在於透過介紹新觀念或西方思潮(訪談記錄,黃年,2001)。他認為,月刊時效性既然不如報紙,想要發揮影響力就須找出不同角度,根據事實深入探討與分析問題。易行(訪談記錄,2001)認為黃年當年很有主見,對編務有自己的想法,再加上處於政治與社會情勢重大改變時期,《綜合月刊》的編輯方針因而有所轉變。

黃年擔任主編時期較常向記者約稿，在專欄規劃上也與前幾期主編任內迥異，可謂是《綜合月刊》組織文化之轉捩點，與前期的差異開始顯現。在訪談過程中，早期編輯也多提及與黃年之後時期的不同，如王力行（訪談記錄，2001）說，「我們很少觸碰尖銳的事件……，黃年、耿榮水以後比較觸及黨外的政治人物與議題」；王道平（訪談記錄，2001）認為，「黃年後比較敢講……，【較前期】有所開展」；汪琪（訪談記錄，2001）表示，「政治立場那個時候比現在單純很多……。我走了後，黃年、翁台生、金惟純進來，他們在政治新聞報導上就來得 aggressive【積極的】多」，顯見黃年時期在《綜合月刊》組織文化發展上之特殊性。

至於在耿榮水（現任財團法人長城文教基金會秘書長）擔任主編時（1979年1月～1979年10月），台灣甫與美國斷交，黨外運動正值最高峰。耿榮水延續黃年對政治社會議題的重視，對黨外民主運動的態度較為同情，故希望藉由《綜合月刊》表達對時事與政治的看法，進而推動政府改革（訪談記錄，耿榮水，2001）。其後續由鄭至慧（現任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接任《綜合月刊》主編職務（1979年12月～1982年2月），鄭與張任飛理念相近，格外重視對社會全面的關照，認為報導必須發掘各層面的問題，而不僅止於政治議題方面的探討（訪談記錄，朱恩伶、鄭至慧，2001）。

總結來說，張任飛在《綜合月刊》創刊初期對社務介入較深，其編輯方針與理想較易實踐。後來逐步將編務交給主編，主編個人的理念與價值觀開始進入《綜合月刊》組織文化；而在歷屆主編中，恐以黃年開啓改變最為關鍵。整體觀之，若主編理念與張任飛相近（如早期之汪琪與皇甫河旺），創辦人的理念就較易維持，但主編對當時組織文化之影響便不顯著，僅扮演傳達與維繫組織文化的角色。但在黃年與耿榮水擔任主編時期，因與張任飛雜誌新聞理念不盡相同，就會改變當時組織文化的某些內涵。

（三）《綜合月刊》組織文化之發展與維繫

根據先前對組織文化之文獻探討可知，新聞組織一旦形成獨特文化，成員可能在進入組織前就已自行「先社會化」，也就是選擇與自己政治或專業立場相似之媒體應徵，而媒體也會有意無意地聘雇與組織價值觀相近的成員，並經由人事結構與組織社會化過程將獨特文化內涵傳遞給員工，以達成維繫組織文化的目的。

《綜合月刊》為私人企業，規模有限，再加上發行人張任飛的個人領導色彩濃厚，並未發展出正式之組織文化維繫機制。其編輯部之人事架構單純，缺乏升遷管道，也無明確之獎懲規定，更少公開招考人員，編輯大多經由介紹進入，聘雇與否全由發行人決定，並非遵循一套行之為文的聘雇標準。在此種情況下，該刊成員的「先社會化」以及「組織社會化過程」在維繫與傳遞組織文化上扮演了相當重要角色。

由於《綜合月刊》並未發展正式聘雇人員原則，錄取編輯也不以考試定奪，張任飛的個人判斷就是《綜合月刊》雇用編輯的標準（訪談記錄，王力行，2001）。但基本上，其成員政治立場傾向並無特別選擇。根據訪談資料分析，張任飛聘雇新進成員乃以專業能力為判定標準，尤重英文能力、見解與創意、文字能力。

如張任飛面試應徵者時，總會問「英文好不好？」、「看不看 *Time*（《時代雜誌》）？」或「看不看 *Newsweek*（《新聞週刊》）？」，應徵者只要回答自己英文不好，通常就不予錄用（訪談記錄，王力行、鄭瑞城、易行，2001）。張任飛也常以英文能力作為選擇邀稿作者的標準，當時《綜合月刊》流傳一則笑話，主編有意請某作家發表意見，張任飛反對的理由是，「可是他英文不好」，足見其對英文能力的重視（訪談記錄，易行，2001）。

張任飛不喜雇用有工作經驗的記者，覺得這些人各方面積習已深，可塑性差，也不會有創意（訪談記錄，賴俊達，2001）。因此，《綜合月刊》聘用的新編輯多是應屆畢業生，如創刊初期的王道平、黃沁珠、鄭瑞城，中期的翁台生、朱邦彥、胡遜、關紹箕，以及後期的黃年、耿榮水、朱恩伶等人皆屬之。

張任飛曾是政大新聞系兼任副教授（1960-1983）。《綜合月刊》創刊時，三位編輯皇甫河旺（民國55年政治大學新聞系第二十六期應屆畢業）、王道平（二十七期）、黃沁珠（二十八期）以及攝影編輯鄭桑溪（二十三期）都是政大新聞系前後期的同學。稍晚進入的編輯也有不少來自政大新聞系，如：王力行為二十七期、鄭瑞城二十九期、鍾行憲、應小端、梁嘉木、韓應寧、王黎明皆為三十期，翁台生、尹萍、李師鄭則為三十四期。

他們可能聽同學或老師談論過《綜合月刊》而心生嚮往（如鄭瑞城與翁台生；見訪談記錄，鄭瑞城、翁台生，2001），或經由已在《綜合月刊》工作的編輯引薦進入（如林秀英為當時任《婦女雜誌》編輯之黃沁珠介紹進入；見訪談記錄，林秀英，2001）。也曾有主編（如汪琪）與編輯（如翁台生）回到新聞系找學弟妹（訪

談記錄，汪琪，2001）請他們支援採訪工作，並在畢業後選擇待下來（如黃年；見訪談記錄，黃年，2001）。還有些編輯並非來自政大新聞系，乃經由《綜合月刊》編輯引薦進入（如金惟純因政大政治研究所階段與黃年同學；見訪談記錄，黃年，2001）。

此外，常有新聞或傳播系學生主動向《綜合月刊》申請實習機會，編輯部也樂於開發新作者而開放機會（訪談記錄，鄭至慧，2001）。有的實習生在畢業後進入《綜合月刊》工作（如朱恩伶），有的則繼續為《綜合月刊》撰稿（如現任中時晚報社長陳國祥）。另有些編輯在學生時代就模仿《綜合月刊》的報導特色而主動投稿，如編輯胡遜（現任聯合報副總編輯）在政大新聞系大三時寫了「指南宮的職業和尚」（第九十四期）投稿，就是一例（訪談記錄，胡遜，2001）。

《綜合月刊》此種經由引薦及實習與寫稿機會選擇先社會化成員的方式（見Ott, 1989），一方面幫助組織挑選合乎《綜合月刊》專業要求的成員，另一方面則協助新進成員更快速地融入《綜合月刊》的組織文化，實為維繫組織文化相當重要之機制。

然而，對大部分受訪編輯來說，維繫《綜合月刊》組織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仍屬「改稿」。《綜合月刊》所有稿件都經修改才能發稿：編輯互相改、主編改、或者張任飛都可能改，而且改字、改詞、改標點、也改段落，主要原則就是要把文章改成清新可讀的白話文，沒有廢字、廢話。

在雜誌創刊時，張任飛不論內、外稿都改，也要求編輯學著改。編輯一旦改得不符他的標準，他就把編輯叫到身旁站著看他改（訪談記錄，皇甫河旺、王力行，2001）。早期王紀五掛名主編時，皇甫河旺與王力行先後負責改稿，對張氏的要求最為了解，鄭瑞城與王道平因而認為他們兩人得到了張任飛「真傳」（訪談記錄，鄭瑞城、王道平，2001）。後來這套改稿標準慢慢為編輯習得，張任飛改稿的情形就隨之減少了，改稿工作轉而由主編改內稿與外稿，編輯則多半改外稿。不過，在新進編輯剛開始工作約前半年的時間，張任飛都會親自修改他們的文章（訪談記錄，鄭瑞城，2001）。

這套嚴謹「改稿」制度往往對新進編輯造成很大壓力，但也讓編輯得以迅速習得《綜合月刊》行事規範。《綜合月刊》並無人事方面的獎懲制度，比較明顯之獎懲方式可謂就是透過改稿讓編輯知道自己的表現是否達到組織的期許標準：如果稿件被改得面目全非，就表示做得不夠好；如果報導在出刊前修改得不多，就表示已

經達到《綜合月刊》的要求。改稿過程對編輯壓力很大，所以編輯們寫完稿後多會自己先改或請其他編輯幫忙改，以免被主編或張任飛改太多而「丟臉」。編輯彼此常打趣道，「你這樣寫，一定會被張先生改成……」，而後來張任飛的改法也常如預期，顯示編輯已經掌握到他的精髓了（訪談記錄，翁台生，2001）。編輯學習的過程往往相當自主，因而很快就能領會《綜合月刊》在改稿方面的要求。

除了改稿機制以外，《綜合月刊》的成員彼此經常互動討論。如張任飛常約編輯們吃飯、喝咖啡，席間話題大都是他對新聞界的批評，鄭至慧（訪談記錄，2001）甚且說「與他說的較多的人，學的也就較多」，足見張任飛對組織文化之影響力。再者，《綜合月刊》也有很多內部討論機會。編輯每天相處在那個只有五、六張大桌子的辦公室裡，原就是同學或前後期學長，彼此熟識。同仁之間的討論也多屬改稿方法及處理新聞的手法，許多題目就在討論間醞釀出來（訪談記錄，胡遜、朱恩伶，2001），也讓新手得以逐漸融入《綜合月刊》的文化。經由成員在工作過程裡的討論，經驗得以傳承，新進成員不但學到《綜合月刊》特有之組織與語言常規，也融入這些常規背後所傳達之組織文化共享價值觀。

在編輯互動過程中，熟手編輯多會告知新進成員「多看《綜合月刊》」（訪談記錄，翁台生，2001），意思是要新手編輯透過觀摩資深編輯的報導來體會《綜合月刊》對報導的要求。尤其在《綜合月刊》前半期專欄比較固定的時候，接任撰寫專欄（如「每月人物」或「即將消失的行業」等專欄）的編輯往往模仿以前編輯的做法；久而久之，有些資深編輯的報導也就因而成為新進成員的典範。

因此，「模仿前人」可謂係《綜合月刊》傳遞與維繫組織文化極為重要機制。新進編輯經由稿件修改以及和熟手編輯與發行人間的互動，以類似傳承制的方式習得《綜合月刊》的行事原則：一方面藉稿件被修改程度的多寡立即且明確地了解表現是否合宜或是否合乎組織要求，另一方面也在頻繁的討論與聊天中內化組織文化的共享價值觀，包括組織選擇報導與改稿的標準等。

簡言之，《綜合月刊》人事架構單純。成員在進入前多已「先社會化」，同質性高，理念不合者在開始工作一段時間後逐漸自行離開，如黃年、耿榮水二人與張任飛的理念差距較大，在張任飛的框架下或感無法施展而離開（訪談記錄，耿榮水、林秀英，2001）。編輯經過工作上頻繁的互動以及改稿制度的控管，雖然沒有制度性的獎懲辦法，仍很快就能掌握組織的行事原則，產生歸屬感。皇甫河旺（訪談記錄，2001）即曾描述編輯利用假日自動加班，將過期期刊寄到國外促銷。黃年

(訪談記錄，2001)也提到曾在送印前一天將整期稿件留在計程車上，因而打電話集結編輯當晚到辦公室加班趕工，隔天仍準時送廠的經驗。

(四) 本節小結——《綜合月刊》之組織文化內涵

《綜合月刊》創刊於民國五〇年代末期，係因張任飛有感於當時社會與新聞界不夠進步，認為社會需要好的綜合性雜誌而創辦。他堅持正派經營與專業態度，講究品質，也重視以創新觀念討論問題。創刊初期自任主編，將理念落實在雜誌運作，隨即成為《綜合月刊》組織文化的核心。時代演變後，主編因應當時情境帶入不同理念，但並未悖離正派經營、專業辦雜誌的理念。

早期主編想法與張任飛相近，對當時組織文化影響並不顯著。黃年與前幾任主編理念差異較大，組織文化內涵在當時改變也最為明顯。但因時代演變，人事更迭，稍後的主編理念也與黃年不同，故對《綜合月刊》組織文化內涵的影響可能也僅在任內而已。即便如此，儘管理念與張任飛不盡相同，歷任主編仍都認同張氏正派與專業辦雜誌之觀念，故《綜合月刊》的組織文化主要係以張任飛創刊時的理念為核心，即「以專業態度正派辦雜誌，並以新觀念探討問題」。此種理念也展現在組織內部具體事物與語言上，如有關印刷廠「中華彩色最怕張任飛」之笑談以及張任飛改稿特色，就展現了《綜合月刊》要求專業之價值觀。此外，《綜合月刊》藉由選擇同質性高之先社會化成員以及改稿機制維繫了組織文化之價值觀——專業素養。

三、《綜合月刊》之組織常規

本研究之第二個研究問題，在於探討《綜合月刊》組織常規的獨特特徵。根據前節所述，新聞風格受新聞工作常規影響深遠，而新聞工作常規又可分為組織常規與語言常規兩部份。新聞工作常規為新聞工作者為加速產製效率長久下來所發展出的獨特工作程序，大多屬於整體新聞界所共享之共通知識或行事原則。在個別新聞媒體內，這一套工作常規則因該媒體之獨特情境與組織文化影響，被轉化為該媒體所特有之產製常規，因而形成媒體獨特之新聞風格。

張任飛性喜師法外國雜誌，欲以企業化方式經營雜誌。他在現代關係社內區隔出雜誌的編輯部與發行、廣告部門，但《綜合月刊》的編務卻始終未制度化。《綜合月刊》沒有編採手冊，成員都是在工作中逐漸體會與融入《綜合月刊》的組織文

化，卻不一定感覺到組織常規存在。研究者根據前節擬定之組織常規指標訪談，於分析歸類之後，以下述三小節呈現《綜合月刊》在組織常規方面之獨特特徵。

（一）產製流程

《綜合月刊》在雜誌生產流程方面並未發展出一套明確規則，對成員而言所有事情都顯得「自然而然」：如沒有正式的編採會議、沒有固定的截稿時間、每位編輯的工作劃分也不明確。在編採會議方面，初期王紀五任主編時便不曾開過編採會議（訪談記錄，王力行，2001），後來漸漸有了「開會」的形式，但開會日期與時間並不固定，規劃的流程也經常與實際狀況有所出入，編輯或約稿作者拖稿以及雜誌脫刊的情形經常發生（訪談記錄，鄭至慧，2001）。因此，編採會議對雜誌工作流程方面的影響不大。

編採會議作用不大，取而代之的就是編輯平時在工作互動過程裡的非正式討論。《綜合月刊》編輯部規模不大，編輯平均只有四、五人，最多時也不過六、七人；討論雖然不正式，卻很深入。每當有新題目出現，主編與編輯會就報導原因、線索、角度、訪問名單或問題深入討論與建議，決定後就開始採訪（訪談記錄，翁台生、胡遜、朱恩伶，2001），並決定報導是否需要攝影配合。《綜合月刊》的文稿編輯與攝影編輯經常共同採訪，這在當時的台灣雜誌界仍屬創新做法（訪談記錄，李淑娟，2001）。

刊物內容或題目的規劃，不論是出於編採會議或各種討論中，《綜合月刊》每個月還是會列出一張工作流程單，上面日期從月初排到月尾，列出文章從截稿（內稿大約在每月五日，外稿則在十日）、發稿（每月十三日）、打字、校正與出版的時程。但工作單上的規定往往無法落實，截稿時間經常延宕。編輯原則上每期至少負責一篇深入報導，採訪兩星期、寫稿一星期後截稿（訪談記錄，翁台生、鄭至慧，2001）。

由於編輯部規模小，成員的工作量大，主編運籌帷幄，掌握整個出刊流程，除了自己寫稿外，還要負責約稿、跑鉛字廠、印刷廠，同時還須改稿。編輯每月至少有一篇報導撰寫工作，有時也會同時進行下下個月的報導，或與其他編輯合作報導。簡言之，主編負責策劃與改內外稿件，而編輯負責報導與改外稿。但也有例外，如黃年與耿榮水任主編時也經常自己寫報導，或如王力行雖非主編也會改編稿件。除大致分工外，其他工作的任務劃分並不固定，合作成份也高。

《綜合月刊》沒有路線規範，編輯們大多依照個人興趣、背景策劃與採訪，偶爾也會報導分配到的文章。在各階段中，編輯部成員興趣不同，路線的劃分也不盡相同。因此，《綜合月刊》並無路線分配的常規，編輯並不像現在新聞記者是被「分配」到不同路線上，多半出於自主「選擇」路線。

（二）新聞價值——關鍵人物選擇報導的標準

張任飛非常重視新觀念，「談論問題……用新觀念提出處理之道」是他為《綜合月刊》訂出的編輯方針，如他就曾要求編輯報導「太平間」（訪談記錄，鄭瑞城，2001）與「陽明山公墓」（訪談記錄，王道平，2001）這些當年很少人處理過的題目。題材選擇範圍則不限，從政治情勢（如「國際問題」專欄）、社會問題（如「國內問題」專欄）、歷史人文（如「即將消失的行業」、「每月人物」等專欄）、保健（如「心理衛生」專欄）、休閒新知（如「信不信由你」、「趣味問答」等專欄）、大眾傳播（如「出版」、「大眾傳播」專欄），只要是可以由新觀念或新角度處理的議題就是好題目（訪談記錄，皇甫河旺，2001）。正如《綜合月刊》的刊名，張任飛對該刊的理想是一份綜合性的雜誌，辦成像是《讀者文摘》的高水準。因為《綜合月刊》不是新聞性或政論性的雜誌，再加上月刊也不太容易處理太具時效的議題，所以他較重視能發掘問題與深入報導的文章（訪談記錄，汪琪、皇甫河旺、鄭至慧，2001）。

但在黃年擔任主編時期（自民國66年9月始），由於發生中壢事件及長老教會發表台灣獨立人權宣言等重大事件，《綜合月刊》在報導選材上開始有了顯著轉變。前任主編所規劃的專欄幾乎全遭刪除，僅留下「信不信由你」與「瞭望台」幾個翻譯專欄，另行每期規劃「專文」或「專題」，如：「訪許信良談中壢警察分局被焚事件」專文（第109期）與「選舉前夕」專題，《綜合月刊》開始重視報導題材是否夠「熱」，希望深入報導重大事件並引起社會討論（訪談記錄，胡遜，2001）。與前期主編皇甫河旺好於選擇知識性文章，胡遜認為黃年較重視爭議性之新聞議題。

相較於黃年與耿榮水時期，鄭至慧任主編時《綜合月刊》對時事的報導又趨減少，專題規劃則改為強調社會關懷面，如：「正視工業公害（第135期）」、「偏遠地區的醫療問題（第142期）」等。鄭至慧在民國68年底接下主編一職，當時美麗島事件剛過，政治議題幾乎沒有報導空間。再加上她個人對社會人文與環境問題的

興趣，報導的選擇標準也就與黃、耿不同（訪談記錄，鄭至慧，2001）。

（三）讀者定位

《綜合月刊》的發行人數不高，每一期銷售情況不同，多則一萬多本，也有僅兩、三千本的時候（訪談記錄，易行、鄭至慧、鄭瑞城，2001）。黃年擔任主編時期，銷售量一度上升（訪談記錄，易行、黃年，2001）。整體而言，《綜合月刊》仍是長年虧損，靠《婦女雜誌》與「現代關係社」的盈餘補貼（訪談記錄，王道平，2001）。在國內銷售點雖多，仍以台北都會地區的銷路較好（訪談記錄，汪琪，2001），再加上脫刊情形頻繁，過了出刊期限才運送，對銷售量影響很大。雖有國外經銷處，真正銷到國外的雜誌數量相當少，多以贈閱方式寄給台灣留學生或僑民（訪談記錄，皇甫河旺，2001）。

《綜合月刊》設定的讀者群為本國的知識份子。在民國六十年底鄉土文學論戰與黨外雜誌興起前，《綜合月刊》即以報導本國讀者感興趣的題材為目標。而《綜合月刊》銷售量集中於台北地區，不必然是雜誌對讀者分布區域設定之結果，而可能是脫刊、通路問題或雜誌設定以知識份子為讀者群之故。整體而言，《綜合月刊》的「閱聽人定位」常規反映了張任飛的理念與編輯方針，也就是一份「為本國知識份子所辦的雜誌」。

四、《綜合月刊》之語言常規

本研究的第三個問題，在於探討《綜合月刊》在語言常規上獨特特徵。根據前節所述，新聞媒體受語言常規影響而會發展出一些特殊的寫作形式，以協助記者更有效率地完成工作。這些語言常規往往為整體新聞界所共享，然個別新聞組織仍可能因其組織文化與情境影響，發展組織獨特之語言風格。以下依訪談資料將本研究所擬定之語言常規指標，分節說明張任飛在寫作結構與修辭技巧方面規定的獨特之處。

（一）寫作形式——深入報導

首先，《綜合月刊》寫作常規仍大致有「標題—導言—軀幹」的傳統新聞寫作結構，但不一定按照事件重要順序排列。導言鋪陳方面與倒寶塔式寫作不同，特別講求一開頭就能吸引人。編輯林秀英（訪談記錄，2001）憶及張任飛常批評當時記

者習於「宗旨式」語句開啓文章（如「爲……而舉辦的活動」），因而特別強調文章第一段要有吸引力，尤其喜歡以小故事或情景描述寫起，像寫故事一樣，先吸引讀者閱讀，再提出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法。文章不只有陳述，還很重視使用引句、製造氣氛，讓報導更生動（訪談記錄，翁台生，2001）。段落間的連結也很重要，張任飛改稿時常大幅調動文章段落（訪談記錄，胡遜，2001），要求段落連結要順暢，盡量避免以連接詞（如「因爲」、「所以」、「雖然」）串接（訪談記錄，朱恩伶，2001）。

《綜合月刊》的標題由主編與編輯在發稿前共同討論決定（訪談記錄，鄭至慧，2001），每期目錄原先只有標題，後來發展出類似報紙新聞標題的副標題形式，力求生動，與報紙新聞習慣使用簡短口號不同。

（二）修辭技巧

在修辭的客觀性方面，張任飛的標準與一般新聞工作常規並無差異，就是要編輯忠實報導事實而不混雜個人判斷或感情，但要「描述而不形容」（訪談記錄，易行，2001）。張任飛很重視新聞與評論的分野，也常批評報章夾敘夾議（訪談記錄，鄭至慧，2001）。寫作規定有：

-- 盡量避免使用形容詞，以免摻雜報導者本身的主觀判斷，如：「他『憤而』把茶杯摔在地上」，就應將「憤而」二字刪去，因爲「憤而」可能是記者自己的判斷（訪談記錄，黃年，2001）。

-- 保持新聞客觀中立，如張任飛當時首先不稱「共匪」、「毛匪」，而代以「毛共」或「中共」，即因前二者不符合新聞客觀標準（訪談記錄，皇甫河旺、鄭至慧，2001）。還有，他認爲能用「他說」就不要用「他強調」，更不要用「他明白表示」（訪談記錄，易行、鄭至慧，2001）。

-- 儘可能不使用驚歎號，此乃因文字若能感動或震撼人心，就不需要由記者用驚歎號告訴讀者。張任飛看到作者驚歎號使用不當曾評說，「難不成要用十個、二十個、一百個驚歎號」（訪談記錄，林秀英，2001）。

-- 平衡報導，他常常提醒編輯再（多）採訪其他消息來源的意見（訪談記錄，王力行，2001），對不同意見加以採用以資「平衡」。

-- 正確報導，他最嚮往國外新聞媒體的查證制度，也曾請專人演講查證制度，目的都在加強編輯們對查證的重視（訪談記錄，翁台生，2001）。

張任飛非常重視報導可讀性，認為除了流暢、精簡、避免陳腔濫調外，文章還要言之有物，有些廣播電台（如警廣）因此時常選播《綜合月刊》文章直接在節目中朗讀播出（訪談記錄，鄭至慧，2001）。歸納而言，他所稱的可讀性包括：白話文（避免「之乎者也」及有文言味的字詞，如「俱」、「均」改用「都」；少用「本人」、「彼者」，改稱「我」；少用「甚」、「頗」，改用「很」（訪談記錄，皇甫河旺、鄭至慧，2001））、多用句號而少用逗點（因為這樣才會有節奏、格調、比較可讀）、避免英式中文或西式倒裝句（訪談記錄，易行、林秀英，2001）、沒有廢字或廢話（避免累贅字詞，如「不要『加以』也可以說明」）、強調短句（張任飛覺得短句才有節奏、才好讀，尤其注意動詞，要求句中有動作，避免以形容詞堆砌成句）。

五、本節小結——《綜合月刊》之新聞風格

綜合上述，《綜合月刊》的新聞風格可綜合整理為：基於對正派、新聞專業以及品質的要求，以獨特的報導與約稿流程，針對本國知識份子所產製之可讀性高的深入報導。

在組織文化方面，張任飛基於個人對雜誌事業產生之理念而創辦《綜合月刊》。歷屆主編在選擇報導題材的標準上雖或與張任飛不同，但仍認同《綜合月刊》組織文化之基本假設，即上述正派與專業辦雜誌的態度。在組織常規方面最特殊者，在於邀稿與報導過程上的專業堅持。編輯報導前充分企劃訪問對象、訪問問題與報導角度，訪問不以電訪，須經數次登門拜訪後才算完成。這些常規嚴格規範成員行為，也傳達《綜合月刊》組織文化對專業、敬業及品質的要求。在語言常規方面，《綜合月刊》報導特色為深入報導體裁，異於一般純淨新聞報導形式，在修辭上特重可讀目標，要求文字簡潔與易讀、易懂，並以改稿機制維繫。

伍、結論——新聞風格影響因素之分析架構

一、研究結果簡述

本研究從探討過去風格之定義出發，試圖了解風格概念並探析新聞風格的內涵。本研究連結傳統文學及修辭學上與作者個人特質有關之討論，並延伸至組織範

嚮探討個別新聞媒體（以《綜合月刊》為例）是否具有新聞風格，以及其新聞風格之內涵為何。本研究在新聞風格影響因素之分析架構下，企圖回答有關「組織文化」、「組織常規」以及「語言常規」三者相互影響之問題，進而探討新聞風格之內涵，所得研究結果簡述如下。

本研究發現，《綜合月刊》的組織文化影響其新聞風格中的組織與語言常規甚深。在關鍵人物方面，創始人兼發行人張任飛的影響最為深遠，其對專業素養、高品質與正派辦雜誌的理念始終為《綜合月刊》組織文化之核心；而主編為高階主管，也在不同時期因應情境演變與個人理念發揮了不同程度之影響。再者，當主編理念與張任飛差異較大時，組織文化內涵受主編影響而改變的部份較為顯著。

在組織文化的維繫方面，《綜合月刊》雇用在專業能力及理念與組織文化接近的成員（多為政大新聞系、所畢業之學生），即已「先社會化」者。《綜合月刊》的編輯（記者）多由學長姐或同學引薦進入，或是已替《綜合月刊》撰稿或報導者，彼此同質性高。再加上改稿制度的嚴格控管，即使缺乏正式獎懲機制與升遷管道，新進成員也能迅速融入並且內化組織價值觀。

在組織常規方面，本研究發現《綜合月刊》的組織常規充分反映其組織文化核心價值觀，成員在工作過程中不斷習得組織常規（即使多屬默識），也展現了組織文化期許的表現。在工作流程、路線分配與截稿時間方面的規範較無系統，往往因期數不同而有異。而在新聞價值方面，主編個人偏好的影響直接，但各時期的新聞價值觀也難免有異，尤以黃年取消大部分專欄，改由討論時事的專題取代最為明顯。

此外，《綜合月刊》的語言常規不但呈現組織文化之影響，更反映了張任飛對文字的專業要求。在寫作形式上，《綜合月刊》以有別於一般純淨新聞寫作的深入報導形式探討問題。在修辭技巧上，《綜合月刊》重視報導的客觀與平衡，又特別強調報導的可讀性，相關語言常規也就特別多，包括使用白話文、多用短句以及避免英式中文與累贅字詞等規定，都相當具有特色。

總之，《綜合月刊》在創始人張任飛以及歷任主編的影響下形成獨特之組織文化，並發展出一套套符合組織需要之規範，如以嚴密改稿與修辭常規控管報導品質，或以嚴謹報導方式獲取組織文化所期許之專業與深入新聞成品。與當時新聞產業行規對照，《綜合月刊》的常規顯現出獨特之處，因的確可謂具備新聞風格。

二、發展命題

本研究由風格概念出發，旨在建立新聞風格之理論內涵，並以《綜合月刊》為個案研究對象，企圖建立命題，作為建構新聞風格分析架構之基礎。根據研究架構及研究所得結果，本研究試圖建立以下命題：

【命題1】新聞媒體組織之新聞風格與組織文化有關。

過去文獻業已指出新聞行業常規與新聞報導間的關連，如Fishman（1980）曾言，新聞常規幫助新聞從業人員將外在世界轉化為新聞報導，故新聞可說是新聞從業人員依循常規加以產製的結果。然而文獻（Shomemaker & Reese, 1991; Sigal, 1973）亦指出，個別媒體會因應組織需求改變新聞工作常規內容，從而影響成員之態度與行為。

本研究發現，《綜合月刊》成員多認同該組織對新聞專業態度的要求，且在工作上遵循此些常規，如報導求精求深、重視可讀性、改稿以及約稿前與作者溝通，皆反映出《綜合月刊》組織文化講究專業素養的內涵。

綜合上述，《綜合月刊》組織文化影響其成員思考與行為模式，而編輯依循組織文化所型塑之獨特工作常規產製新聞，展現出《綜合月刊》在組織以及語言方面之獨特特徵，因而具有新聞風格，反映出新聞風格與組織文化之間確有關連。

【命題1-1】新聞媒體組織之新聞風格與組織之發行人（或領導人）有關。

相關文獻（如：Schein, 1985; Bryman, 1996; Ott, 1989）均曾指出，領導者對組織文化具有決定性影響力，且組織內關鍵人物之領導風格具體影響了整個組織以及組織內各次團體與成員的表現（Harris, 1993）。而在影響組織文化的領導者方面，創始人的角色尤其重要：他們將價值觀與基本假設（basic assumptions）帶入組織，樂於將其理念加諸於合夥人與員工身上，作為組織創建初期的適應之道（Schein, 1985; Ott, 1989）。除創始人外，組織的某些管理者也可能扮演重要領導者角色，因而影響組織文化（Schein, 1985; Bryman, 1996; Anthony, 1994）。

由上述所引文獻觀之，領導者似為組織文化建立之決定性因素，本研究稱之為

「關鍵人物」。根據本研究發現可知，《綜合月刊》創始人兼發行人張任飛為該組織文化之主要關鍵人物，將個人對雜誌事業之理想抱負帶入《綜合月刊》，循獨特用人標準聘雇與其理念接近之成員，經由改稿過程與成員間的互動在有意無意間傳遞理念，以維繫《綜合月刊》的組織文化。研究訪談結果亦顯示，《綜合月刊》受訪成員皆強調新聞報導之專業素養，在工作表現上也力求高品質，反映出新聞媒體組織文化與領導人間確有關連。

【命題 1-2】新聞媒體組織之新聞風格與組織文化之高階主管有關。

Bryman (1996) 指出，組織領導即創造、維繫以及改變組織文化之過程。創始人在組織創建初期對組織文化的影響最大，其理念即組織文化主要內涵，而早期領導者也會追隨創始人腳步，扮演維繫及強化組織文化的角色。然而經過一段時間以後，隨著外在環境改變，組織內長期延續之文化可能反被視為妨礙組織發展的因素；此時，組織創始人或其他領導者就有可能改變原有組織文化。而創始人在組織漸上軌道後，亦會逐漸減少對組織運作的干涉，其對後期組織文化的影響力也不必然存在 (Alvesson, 1993)。

本研究發現，《綜合月刊》早期主編（如皇甫河旺與汪琪）的理念與張任飛接近，編採方針變化不大，《綜合月刊》創建時期的組織文化因而延續。但自黃年在《綜合月刊》創刊九年後（民國 66 年）接任主編職務，當時張任飛對編務介入已少，黃年及其後各主編分別因應政治社會情境的演變，適時地將個人理念融入《綜合月刊》組織文化。

由上述得知，在新聞組織創建初期，高層主管（如主編或總編輯）扮演傳遞與維繫組織文化上的角色，而在營運經歷一段時間以後，後期來自高層主管對新聞風格的影響也較為顯著，組織文化變化也就較為顯著。

【命題 2】新聞媒體組織之新聞風格與外在情境有關。

影響新聞風格之情境因素，可分以下二點陳述：

【命題 2-1】新聞媒體組織之新聞風格與整體行業常規有關。

Barthes (1971) 曾整理風格意涵，指出風格乃相對於常規的變異，具有獨特特徵之作品如與一些較具標準性質的做法相較，特殊之處就會顯現出來。本研究探索《綜合月刊》之新聞風格，發現其組織文化呈現出對新聞高品質與專業素養之要求，此點也展現在工作常規上。如在組織常規方面對改稿與約稿流程的要求，以及在語言常規方面對深入報導形式的規範，都係與當時一般新聞媒體相較之下所顯現出的獨特之處，《綜合月刊》也因而具有其特殊新聞風格。換言之，《綜合月刊》的新聞風格一方面來自組織文化的影響，係對當時新聞行業常規之調整與選擇的結果，另一方面則與當時一般新聞行業常規顯現較多特殊之處；由此可知，新聞媒體之風格應與整體行業常規有關。

【命題2-2】新聞媒體組織之風格與社會文化情境有關。

本研究發現，組織文化關鍵人物的影響力乃因應社會文化情境的演變而產生。如張任飛認為當年台灣社會需要現代化，且企業化經營之專業雜誌可幫助國家現代化，因而創辦《綜合月刊》。主編或維繫張任飛理念，或為《綜合月刊》組織文化加入個人理念，都是配合歷年來社會情境演變所作的選擇，如黃年在黨外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擔任主編，即強調對重大政治議題之深入探討。而鄭至慧有感於環境議題未受社會重視，因而特別增加相關討論，均顯示社會文化情境對新聞風格之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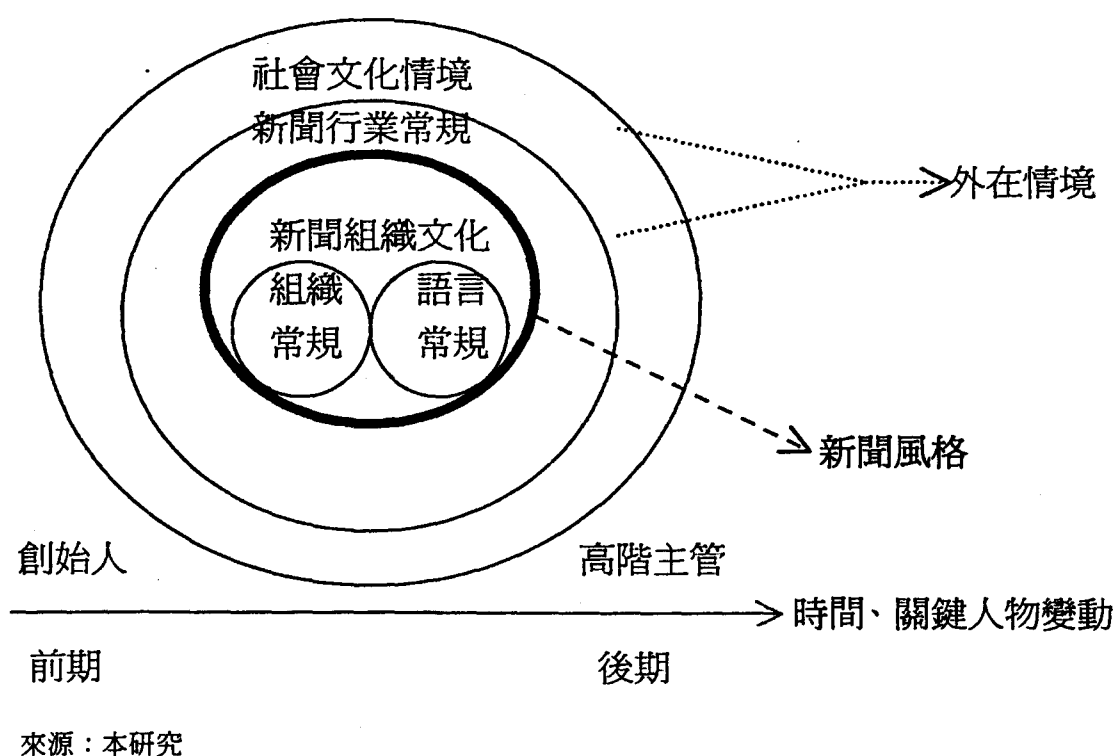
整體而言，《綜合月刊》關鍵人物對組織文化的影響，除來自其個人特質與理念外，也是時代的產物；新聞風格自然與社會情境自然有不可劃分之關係。

三、研究架構修正

根據【命題2】，新聞風格乃情境產物，而【命題1】則強調新聞組織創始人與不同時期高階主管與該組織之文化以及工作常規相關。本研究先前之新聞風格研究架構圖（見圖二）雖已提及社會情境因素為新聞風格內涵之一環，卻未強調社會情境會隨時間改變（如《綜合月刊》創刊初期與黃年任主編時期之政治情勢變異）。此外，先前有關組織文化關鍵人物的討論也未將關鍵人物與情境和時間因素合併討論。因此，新聞風格內涵似須再加入動態的時間層面，以及在不同時間之關鍵人物

的影響。

另據【命題2-2】，新聞風格須與行業常規合併觀之，本研究先前架構雖提及新聞媒體因應個別需求與組織情境，而將新聞行業工作常規轉化為組織特有之常規，卻忽略個別新聞組織之新聞風格尚須與整體行業常規對照，方能凸顯其獨特之處。因此，在新聞組織外在情境除社會文化之外，還須加入新聞行業常規的因素，新聞風格之分析架構方可更為詳盡。根據上述，本研究修正後之新聞風格內涵架構可參見圖三。



圖三：修正後新聞風格內涵之架構圖

四、研究意涵與未來研究方向

「新聞風格」過去一直是廣為使用的詞彙，但有關新聞風格的描述或語焉不詳，或缺乏相同之判斷標準，與「風格」之別也僅止於所描述者為新聞媒體而已。本研究之目的乃將新聞風格與風格區隔開來，並針對新聞風格內涵深入探究。

在理論意涵上，本研究除延續傳統風格研究對創作者獨特特徵之重視，還特別

強調情境因素對新聞風格的影響。本研究探究新聞風格影響因素，在於試圖將新聞媒體之獨特特徵「放回」特定情境中（指放回至新聞行業常規及社會文化情境，見【命題2】），分析該媒體在當個時代是否有與眾不同之處，然後再決定是否展現了新聞風格。故新聞風格不再只是籠統的「特色」，而係在某個「特定情境」下的特色。

這些新聞風格情境因素，包括社會文化情境、行業常規以及新聞媒體的組織文化情境（見圖三）。換言之，本研究認為，特定社會文化情境產生特定之新聞行業常規不但影響整體新聞界之風格，也會持續影響特定新聞媒體就當時新聞行業常規所慣用之工作常規進行修正或選擇，因而發展出獨特之組織工作常規。再者，個別新聞組織的工作常規決定該新聞媒體是否具備新聞風格之重要因素，而判定方法便是將該媒體與當時行業常規加以比照。

本研究既重視情境因素與新聞媒體組織文化對新聞風格之影響，新聞風格自然就非僅是靜止概念。不同時間的社會文化情境與新聞行業常規自然影響特殊新聞媒體組織文化以及其工作常規，其所呈現之新聞風格因而亦可能變動。以運作歷十四年的《綜合月刊》為例，張任飛的影響在創建初期較為顯著，早期主編也扮演著維繫與傳遞張任飛所創立之組織文化的角色。但從黃年擔任主編時期開始，因應政治社會狀況的變動，《綜合月刊》前期的組織文化面臨轉變。張任飛的理念雖仍是組織文化主要內涵，但主編的影響力也開始較為顯著，在報導題材上開始處理當時熱門政治議題。鄭至慧擔任主編時則值後美麗島事件時期，台灣政治社會情境急遽變動，黃年主編時期所帶來的影響再度面臨調整。再加上鄭至慧與張任飛理念仍屬契合，張氏對《綜合月刊》組織文化的影響又轉為顯著。

在研究方法方面，受限於本研究之個案《綜合月刊》乃一已停刊之新聞媒體，僅能以深入訪談法蒐集資料，經由訪談對象描述了解《綜合月刊》組織內部運作狀況。但因未曾直接進行真實情境資料的蒐集工作，本研究無法獲取許多《綜合月刊》在組織文化與常規方面較不可察且屬成員間共享卻影響深遠之資料。本文亦未如其他風格文獻係由文本分析切入，因而無法妄稱綜合月刊之風格體（或可稱為「綜合月刊體」）究係為何。至於其與七〇年代之台灣新聞業撰寫方式有何異同，又與現有新聞體間之差異為何，亦都限於本文僅由組織文化之常規著手而難以綜論。

張文強（1999）曾指出，新聞工作涉及大量問問題、查證與寫作等程序性知識，乃記者隨經驗累積所習得並執行，因無法言傳而僅被視為經驗問題。以本研究

對《綜合月刊》組織文化之探究為例，在人造物件層次，研究者蒐集到之資料皆為較具體與較易為成員感知的部份，如《綜合月刊》編輯部辦公室空間陳設、約稿信以及辦公室內傳閱之剪報等。而成員較難感知、記憶或描述的成份，如成員特有之語言使用習慣（如各種隱喻或行話）以及行為模式（如非正式之慶典、儀式或獎懲方式等）（Schein, 1985），就難以藉由深入訪談法得知。

因此，後續研究若能配合對研究對象之實際親身觀察，以參與觀察法在自然情境中研究新聞媒體組織與語言常規特色，應能蒐集到更為詳細的資料。如在新聞價值觀常規方面，似可以內容分析探究該媒體在不同總編輯任內報導主題的差異。在語言常規方面也可以論述分析方式比較該新聞媒體在報導寫作形式與修辭方面與其他新聞媒體間的差別，以深刻知曉該媒體在組織以及語言常規方面的獨特特徵。此外，未來研究如能針對不同新聞媒體間的風格進行比較，亦應能更為豐富新聞風格研究之內涵。本文僅針對單一個案進行討論，其他新聞媒體（如商業或公共媒體）之風格差異，未來應是可續進行分析之有趣題材。

參考書目

- 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編輯委員會主編（1978）。《中華民國當代名人錄》，頁1318。
台北：中華書局。
- 巴東（1996）。《張大千研究》。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 王宏喜主編（1992）。《文體結構舉要》。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
- 石璞（1983）。《歐美文學史（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石永貴（1983）。〈盡瘁雜誌事業的張任飛先生〉，《傳記文學》，43（1）：97-8。
- 冷若水主編（1984）。《中央社六十年》。台北：中央社六十週年社慶籌備委員會。
- 李明水（1986）。《台灣雜誌事業發展史》。台灣省政府出版。
- 杜黎均（1992）。《文心雕龍文學理論研究和譯釋》。台北：曉園出版社。
- 林乾文（1998）。《組織文化、領導型態與領導行為之相關性研究——以媒體組織為例》。私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皇甫河旺（1991）。〈第九篇：雜誌事業之發展與現況〉，（編輯委員會編）《中華民國新聞年鑑（八十年）》，頁371-381。台北：中國新聞學會。
- 姜岱東（1996）。《文學風格概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翁台生 (1983年6月9日)。〈自由中國的亨利魯斯〉，《民生報》，第7版。
- 翁秀琪、鍾蔚文、簡妙如、邱承君 (1999)。〈似假還真的新聞文本世界：重現超經驗事件〉，《新聞學研究》，58: 59-83。
- 國立政治大學 (1961)。〈「新聞系出版指導委員會」〉，《國立政治大學校刊》，第七期，第十一版：131。
- 張文強 (1999)。《報社組織知識儲存與分享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 張文勳 (1994)。《文心雕龍探密》。台北：業強出版社。
- 張任飛 (1983)。〈雜誌的發展與現況【鄭竹霞整理】〉，《大眾傳播學刊》，9: 68-72。
- 張任飛 (1982年2月)。〈不希望這是本刊向讀者們的告別辭〉，《綜合月刊》，159: 6。
- 張任飛 (1980年11月)。〈美英報刊侵入亞洲〉，《新聞評議》，71: 3-5。
- 張任飛 (1976年4月)。〈中國的雜誌事業〉，《綜合月刊》，89: 21-4。
- 張任飛 (1975年6月)。〈亞洲的雜誌出版人的責任〉，《綜合月刊》，79: 103-7。
- 張任飛 (1971年9月16日)。〈報界面臨的問題〉，《聯合報二十週年特刊》，第十五版。
- 張任飛 (1968年11月)。〈創刊詞〉，《綜合月刊》，1: 4。
- 張德明 (1995)。《語言風格學》。高雄：麗文文化。
- 許舜青 (1994)。《新聞寫作歷程初探》。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沁珠 (1983年7月)。〈追懷本會委員張任飛先生〉，《新聞評議》，142: 2。
- 楊志弘、林美惠 (1989)。〈中華民國雜誌事業〉，(行政院新聞局編)《中華民國出版事業概況》，頁103-144。
- 楊素芬 (1996)。《文本類型對閱讀的影響：以新聞體與小說體為例》。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臧國仁、施祖琪 (1999)。〈新聞編採手冊與媒介組織特色-風格與新聞風格〉，《新聞學研究》，60: 1-38。
- Abrams, M. H. (1981).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4th Ed.). New York, NY: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Ackerman, J. S. (1963). Style. In J. S. Ackerman & R. Carpenter (Eds.), *Art and archaeology* (pp. 164-186). London: Prentice-Hall.

- Alvesson, M. (1993).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organization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nthony, P. (1994). *Managing culture*.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Barrat, D. (1986). *Media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 Barthes, R. (1971). Style and its image. In S. Chatman (Ed.), *Literary style: A symposium* (pp. 3-1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ll, A. (1991). *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Oxford, UK: Blackwell.
- Breed, W. (1997). Social control in the newsroom. In D. Berkowitz (Ed.), *Social meanings of news: A text-reader* (pp. 107-122).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ryman, A. (1996). Leadership in organizations. In S. R. Clegg, C. Hardy, W. R. Nord. (Eds.),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studies* (pp. 276-292). London: Sage.
- Campbell, L. R., & Wolseley, R. E. (1961). *How to report and write the new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Carter, R., & Nash, W. (1990). *Seeing through language: A guide to styles of English writing*. Oxford, UK: Blackwell.
- Cohen, M. D. (1996). Individual learning and organizational routine--Emerging connections. In M.D. Cohen & L.S. Sproull (Eds.),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pp. 188-194).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anziger, M. K., & Johnson, W. S. (1966).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riticism*. Boston, MA: Heath.
- Enkvist, N. E. (1973). *Linguistic stylistics*.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Mouton.
- Enkvist, N. E. (1964). On defining style: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In N. E. Enkvist, J. Spencer & M. J. Gregory (Eds.), *Linguistics and style* (pp. 1-5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pstein, E. J. (1973). *News from nowhere*. New York, NY: Random House.
- Fishman, M. (1980). *Manufacturing the news*.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Gans, H. J. (1980). *Deciding what's news*.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Harris, T. E. (1993). *Applied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Hillsdale, New Jersey: LEA.
- Hirsch, P. (1977). Occupational,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models in mass media research. In P. M. Hirsch, et al. (Eds.), *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13-42). Beverly Hills, CA: Sage.

- Keyser, S. J. (1980). Wallace Stevens: Form and meaning in four poems. In M. K. L. Ching, M. C. Haley & R. F. Lunsford (Eds.),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literature* (pp. 257-281). London: Routledge.
- Lang, B. (1987) (Ed.). *The concept of styl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eyer, L. B. (1987). Toward a theory of style. In B. Lang (Ed.), *The concept of style* (pp. 21-72).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iles, J. (1974). *Poetry and cha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olotch, H. & Lester, M. (1974). News as purposive behavior: On the strategic use of routine events, accidents, and scandal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 101-112.
- Munro, T. (1963). *Evolution in the art and other theories of culture history*. New York, NY: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 Ott, J. S. (1989).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perspective*. Pacific Grove, CA: Brooks/Cole.
- Peyre, H. (1989[1965])(Ed.). [徐繼曾譯 (1992)。《方法、批評及文學史—朗松文論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Phillips, E.B. (1977). Approaches to objectivity: Journalistic vs.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s. In P. M. Hirsch, et al. (Eds.), *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63-78). Beverly Hills, CA: Sage.
- Preminger, A. (Ed.) (1986). *The Princeton handbook of poetic term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ubin, H. J., & Rubin, I. S. (1995). *Qualitative interviewing: The art of hearing data*.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chein, E. H. (1991). The role of the founder in the creation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P. J. Frost et al. (Eds.), *Refram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 (pp. 14-25). Newbury Park, CA: Sage.
- Schein, E. H. (1985).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 Schultz, M. (1994). *On study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s: Diagnosis and understanding*. Berlin: de Gruyter.
- Seidman, I. E. (1998). *Interviewing as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for researchers in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2nd Ed.).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hoemaker, P. J., & Reese, S. D. (1991). *Mediating the message: Theories of influence on mass media content*. New York, NY: Longman.
- Sigal, L. V. (1973). *Reporters and officials: The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of newsmaking*. Lexington, MA: D.C. Heath and Company.
- Sigelman, L. (1973). Reporting the new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9, 132-151.
- Thornborrow, J., & Wareing, S. (1998). *Patterns in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literary style*. London: Routledge.
- Tuchman, G. (1978). *Making new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Tuchman, G. (1977). The exception proves the rule: The study of routine news practice. In P. M. Hirsch et al. (Eds.), *Strategies f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p. 43-62). Beverly Hills, CA: Sage.
- Tunstall, J. (1971). *Journalists at work*. London: Constable.
- Turow, J. (1992). *Media system in society: Understanding industries, strategies, and power*. NY: Longman.
- Ullmann, S. (1957). *Style in the French nov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Dijk, T. A. (1988). *News as discourse*. Hillsdale, NJ: LEA.
- Verma, S. K. (1980). Topicalization as a stylistic mechanism. In M. K. L. Ching, M. C. Haley & R. F. Lunsford (Eds.),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literature* (pp. 283-294). London: Routledge.
- Warner, M. (1970). Decision-making in network television news. In J. Tunstall (Ed.), *Media sociology: A reader* (pp. 158-167).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附錄一 訪談記錄 (按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 王力行，2001年4月10日訪問。
王道平，2001年4月23日訪問。
朱恩伶，2001年5月1日訪談。
汪 琪，2001年3月2日訪談。
李淑娟，2001年4月20日訪談。
易 行，2001年4月30日訪談。
林秀英，2001年4月20、4月22日訪談。
皇甫河旺，2001年3月8日訪談。
耿榮水，2001年3月9日訪談。
胡 遜，2001年4月17日訪談。
翁台生，2001年3月15日訪談。
陳忠慶，2001年5月3日訪談。
黃 年，2001年4月12日訪談。
鄭至慧，2001年3月17日、5月1日訪談。
鄭瑞城，2001年4月28日訪談。
賴俊達，2001年5月16日訪談。

Reexamining the Concepts of Style and News Style - Analysis of the Scooper Monthly (1968-1982)

Tina Shih and Kuo-Jen Tsang*

ABSTRACT

Following our earlier research on style and news style, in this study we use the Scooper Monthly as our case-study subject trying to figure out whether our earlier definition of style can be applied to this news organization. We interviewed 16 editors who had worked at the magazine from the late 1960s to the early 1980 and found that the news style of this magazine had been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its first publisher and founder, Mr. Ren-Fe Chang, who not only regulated the organizational and linguistic routines, but also formed the doctrines of what is right as a news professional in a magazine like the Scooper Monthly.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siders that news style may be defined as special features of a news organization as reflected upon its working routines by its coalition leadership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particular social environment.

Keywords: style, news styl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news routines, the Scooper Monthly

* This paper is originated and abridged from Tina Shih's master thesis (August, 2001,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while Kuo-Jen Tsang was supervisor. Shih is currently a PR specialist at IBM Taiwan, and Tsang on the faculty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